

2011 年第 5 期

总第 49 期

学科信息参考

A 辑

（经贸、金融、会计、管理、信息）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

学科信息参考

2011 年第 5 期 总第 49 期

目 录



主办: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

顾问:

叶兴国 胡雪梅

主编:

王 群 谢丹迎

责任编辑: 孔凡娟

编辑:

经贸: 李静

金融: 唐永辉

工商管理、商务信息: 李谋信

制作: 艾致

出版日期:

2011 年 9 月 30 日

国际贸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FDI 流入能替代进口贸易吗?——基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研究..... 1

产业经济

贸易强国视角下的流通产业结构调整..... 10

物流管理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16

技术经济与管理

基于可研报告的公路 BOT 项目投资风险快速分析..... 20

会计学

“A”型会计人才实验教学效果分析及启示——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 25

“国际会计”课程教学之改进思考..... 32

金融学

保险资金投资于低碳行业的行为金融学分析..... 36

企业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核心发展力实证研究..... 38

统计学

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基本思路..... 43

快 讯

美经济低迷 中美贸易“正面相撞”或增多——专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何伟文.....	49
高利贷的沃土.....	51
艰难的抉择: 全球 CEO 更替新趋势.....	53
2011 年 6 月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7.0%.....	6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FDI 流入能替代进口贸易吗？

——基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快速发展。2008 年中国进口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分别为 11325.6 亿美元和 8526.13 亿美元，是 1983 年的 104 倍和 930.8 倍。虽然这一时期两者的增长速度惊人，但是很明显 FDI 的增速更快。进口贸易从改革开放后快速增加，而 FDI 的大量流入则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中国进口贸易和 FDI 流入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在 1998–2001 年期间，90% 的 FDI 流入中国沿海城市（Amiti and Wen, 2001）。2010 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域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 13%。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FDI 的流入是否会影响进口贸易的增长？FDI 的流入会替代进口贸易吗？

FDI 的流入与进口贸易的关系如同 FDI 的流出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以往对 FDI 与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 FDI 流出和出口贸易的角度展开，如新古典贸易 H-O-S 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替代资本等要素流动，国际贸易中间接包含着要素的流动。同样，Mundell（1957）指出，在各国技术相同时国际贸易和国家要素流动是相互替代的。如果 H-O-S 理论成立，那么中国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口贸易将替代这些国家的 FDI 流入中国。但是我们发现，大量 FDI 流入地区同时也是进口较多的地区。Liu 等（2001）在进口贸易与 FDI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进口的增长引起 FDI 流入，而 FDI 流入同时也会增加本地出口额。

多数研究表明 FDI 与对外贸易可能为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1）水平型 FDI 还是垂直型 FDI？水平型 FDI 和垂直型 FDI 会对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垂直型 FDI 会增加贸易，水平型 FDI 会减少贸易（Markusen, 1995; Markusen and Maskus, 2002）；（2）市场导向型 FDI 还是效率型 FDI？同样，市场导向型 FDI 和效率型 FDI 对贸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市场导向型 FDI 只是为了获得国外的市场，因此会减少贸易，而效率型 FDI 会增加中间环节在全球的生产，贸易会增加（Markusen and Maskus, 2002）；（3）FDI 流入还是 FDI 流出？异质的 FDI 与贸易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FDI 的流入与贸易有着正向的关系，而 FDI 的流出对贸易有着负向的关系（Pain and Wakelin, 1998）；（4）中间品出口还是最终品出口？双边的 FDI 和最终品的出口有着负向的关系，但是与中间品出口却有着正向的关系（Head and Ries, 2001）；（5）进口还是出口？FDI 的流出对本国的出口产生短暂的影响，但是对本国的进口则产生持续的影响。此外，部分学者指出，不同行业的贸易和 FDI 的关系也会不同（Blonigen, 2001）。

在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间贸易仍然占据主导。发展中国家通常进口本国资源禀赋较低的产品，如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共同影响着 FDI 和对外贸易（Pfaffermayr, 1996）。正如新贸易理论所言，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通常选择出口，而效率低的企业则通常选择供应本地市场对产品的需求（Melitz, 2003）。大量的实证研究从

贸易效应角度证实外商直接投资至少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进出口有着显著的影响（冼国明等，2003；王少平、封福育，2006；周靖祥，2009）。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考察贸易成本的变化对 FDI 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正如 Markusen（1998）以及 Markusen 和 Venables（1999）所言，随着不发达国家本地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要素禀赋的变化，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因此，本文的研究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动态视角出发，以揭示 FDI 流入与进口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和经验假说，构建 FDI 流入与进口贸易的关系，重点探讨贸易自由化引起 FDI 与进口贸易之间关系的变化，提出经验假说；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与数据，主要说明计量模型中变量的选取、数据的来源以及计量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四部分为本文研究的计量结果，重点考察 FDI 流入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同时说明中国地区间的差异；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

2 理论模型与经验假说

2.1 基本假设

本文研究中我们建立了 $3 \times 2 \times 2$ 的三地区、两部门、两要素的模型。模型中三地区我们分别用 $i = 1, 2, 3$ 来表示，代表本国、自由贸易区其他国家（下文简称为“F 国”，本文中以东盟为例）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除 CAFTA 外的其他国家，下文简称为“W 国”）；各地区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L）和资本（K），其中劳动力限于区域内部门之间的流动，资本则可以在区域之间流动；两部门分别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中传统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CRS）和完全竞争为特征、生产同质品、仅使用劳动力一种要素作为投入；现代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IRS）和完全竞争为特征、生产异质品、生产中使用资本作为固定投入和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同质品区际间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异质品区域间贸易遵循“冰山贸易成本”（ τ ）。本文研究中传统部门变量我们使用上标且表示，现代部门变量使用上标 M 表示，整个经济系统对应变量使用上标 IV 表示。

2.2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效用函数由两层效用函数构成，与 Pflueger（2004）相似：上层效用函数为同质品和异质品组合的拟线性效应函数；下层效用函数采用 Dixit 和 Stiglitz（1977）的 CES 效应函数，为异质品组合消费的效用函数。 i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_i = \alpha \ln M_i + A_i, M_i = \left\{ \int_{\theta=0}^{n^w} [x_i(\theta)]^{\frac{\sigma-1}{\sigma}} d\theta \right\}^{\frac{\sigma}{\sigma-1}}, \text{其中 } \sigma > 1 > \alpha > 0 \quad (1)$$

如果以同质品为计价物，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P_i M_i + A_i = Y_i, P_i = \left\{ \int_{\theta=0}^{n^w} [p_{ij}(\theta)]^{1-\sigma} d\theta \right\}^{\frac{1}{1-\sigma}} \quad (2)$$

其中 U 为总效用， M 为消费者对异质品的需求量，且为消费者对同质品的需求量， x 为不同种类产品的需求量， $n^w = n_1 + n_2 + n_3$ 为三地区异质品种类数总和， σ 为任意两种异质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P_i 为 i 地区的异质品组合价格指数， p_{ij} 为 i 地区生产的异质品在 j 地区的价格， α 为正的常数， Y 为消费者的总支出。在约束条件（2）下最优化消费者效用函数（1），则可以得到消费者对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的需求量 A 、 M 以及 j 地区消费者对 j 地区异质产品的需求：

$$M = \alpha/P, A = Y - \alpha, x_{ij} = \alpha (p_{ij})^{-\sigma} (P_i)^{\sigma-1} \quad (3)$$

i 地区的进口总额 X_i 由两部分构成:

$$X_i = \sum_{j=1}^3 p_{ji} x_{ji} (L_i + K_i) \quad i, j = 1, 2, 3; i \neq j \quad (4)$$

2.3 生产者行为

传统部门生产规模收益不变,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出售产品, 因此同质品的价格为 $P^A = MC = a^A w$, 其中 a^A 为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 w 为劳动力工资。我们以同质品为计价物, 设 $a^A = 1, w = 1$, 则 $P^A = 1$ 。由于我们假设同质品区域间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 三地区的同质品价格相同, 即 $P_i^A (i = 1, 2, 3)$ 。

我们假设现代部门各地生产技术相同, 企业生产异质品需要投入 1 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和 a_M 单位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 因此 i 地区企业生产 c_i 单位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f_i = r_i + a_M w_L c_i \quad (5)$$

其中, r_i 表示 i 地区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企业的利润为:

$$\Pi_i = p_i c_i - f_i \quad (6)$$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根据张伯伦垄断竞争产品加成定价, 产品价格为:

$$p_i = a_M / (1 - 1/\sigma) \quad (7)$$

由于企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中可以自由进出, 均衡时企业获得零利润。根据 (6) 式以及 (7) 式, 企业的资本收益为:

$$r_i = \frac{p_i c_i}{\sigma} = \frac{a_M c_i}{\sigma - 1} \quad (8)$$

由 (8) 式我们可以得到, 均衡时企业的产量:

$$c_i = (\sigma - 1) r_i / a_M \quad (9)$$

将 (8) 式代入 (2) 式, 再利用我们前文所假设的地区企业数与资本数相一致 ($n_i = K_i$), 我们可以得到地区异质品的价格指数 P_i :

$$P_i = \begin{cases} p_i [K_i + K_j (\tau_{12})^{1-\sigma} + K_3 (\tau_{13} + \tau)^{1-\sigma}]^{1/(1-\sigma)}, & i = 1, 2 \\ p_3 [K_3 + \sum_{j=1}^2 K_j (\tau + \tau_{ij})^{1-\sigma}]^{1/(1-\sigma)}, & i = 3 \end{cases} \quad \text{其中 } j = 1, 2; i \neq j \quad (10)$$

2.4 贸易自由化、FDI 与进口贸易

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 FDI 的流入是否会导致进口的增加或者减少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本文研究过程中我们假定了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 即地区企业异质企业的边际投入相同。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加成定价, 则本国、F 国以及 W 国的异质品具有相同的出厂价 ($p_i = p_j, i \neq j$)。将 (3) 式、(9) 式和 (10) 代入 (4) 式, 我们可以得到:

$$X_i = \alpha \sum_{j=1}^3 \phi_{ji} (L_j + K_j) / P_i, i \neq j \quad (11)$$

其中, $\varphi = \tau^{1-\sigma}$ 即为 Baldwin 等 (2003) 所定义的地区间贸易自由度。为说明中国加入东盟后 FDI 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下文中我们将本国看作中国、F 国看作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W 国看作除 CAFTA 外的世界其他国家。(11) 式展开即为:

$$X_1 = \alpha \left[\frac{\phi_{21}(L_2 + K_2) + \phi_{31}(L_3 + K_3)}{K_1 + \phi_{12}K_2 + \phi_{13}K_3} \right] \quad (12)$$

为简化, 我们假设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对等, 即 $\varphi_{12} = \varphi_{21}$ 、 $\varphi_{23} = \varphi_{32}$ 和 $\varphi_{13} = \varphi_{31}$ 。进一步, 我们考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FDI 流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 FDI 流入两种不同的情形。由于两种情况是对称的, 因此我们只考察 F 国资本流出至中国与 W 国的情况。

(1)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如果东盟对两国资本流动对等, 则对 (12) 式求关于 K_2 的偏导数, 我们得到:

$$\frac{\partial X_1}{\partial K_2} = \alpha \phi_{12} \frac{K_1 - \phi_{12}L_2 - \phi_{13}L_3}{(K_1 + \phi_{12}K_2 + \phi_{13}K_3)^2} \quad (13)$$

(13) 式中分母始终大于 0, 其值正负取决于分子。当 $\varphi_{12} < (K_1 - \varphi_{13}L_3) / L_2$ 时, $\partial X_1 / \partial K_2 > 0$, 即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为互补关系。其中, $\varphi_{12} = (K_1 - \varphi_{13}L_3) / L_2$ 为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为替代或互补关系的临界值。因此, 当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比较小的时候, 东盟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将会增加中国的进口贸易; 而在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突破某个“门槛值”的时候, 东盟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将会减少中国的进口贸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1: 如果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资本地理分布成比例, 则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突破某个“临界值”之后, FDI 流入将导致中国进口贸易减少。

(2)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与东盟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贸易自由化同样会对中国进口贸易产生影响。对 (12) 式求关于 φ_{12} 的偏导数, 得到:

$$\frac{\partial X_1}{\partial \phi_{12}} = \alpha \frac{(L_2 + K_2)K_1 + \phi_{13}(K_3L_2 - K_2L_3)}{(K_1 + \phi_{12}K_2 + \phi_{13}K_3)^2} \quad (14)$$

如果 W 国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重小于等于 F 国, 即 $(L_3 / K_3) \leq (L_2 / K_2)$, 那么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总是能够促进中国进口贸易增长。而当 W 国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重大于 F 国时, 即 $(L_3 / K_3) > (L_2 / K_2)$ 时, 当且仅当 $\varphi_{13} < (L_2 + K_2)K_1 / (K_2L_3 - K_3L_2)$ 时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才能促进中国进口贸易

易的增加。而此时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度比较高时,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而会减少中国进口贸易。由此,我们得到命题 2:

命题 2: 在 FDI 流入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能否增加中国进口贸易还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如果 W 国劳资比大于 F 国,当 $\phi_{13} < (L_2 + K_2)K_1 / (K_2L_3 - K_3L_2)$ 时,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才会促进本国进口贸易的增加。而在 F 国劳资本比大于 W 国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总能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增加。

根据命题 1、命题 2,我们提出如下经验假说: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 FDI 流入是否会导致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加主要取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自由度、中国劳动力数量以及本国资本存量等。

3 计量模型与数据

3.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重点考察贸易自由度以及 FDI 的流入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经验假说中还指出资源禀赋和资本禀赋与本国的进口贸易是密切关联的,这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此外,在一些经验研究中指出汇率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进口贸易有着影响,如果在我们的计量研究中不考察这些指标,可能因变量遗漏而导致残差项不服从白噪声的假设造成有偏估计。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这些因素设为控制变量。本文研究中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各省份作为样本地区,因此计量模型设定为:

$$\ln X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FDI_{i,t} + \alpha_2 \ln \phi_{12,t} + \alpha_3 \ln \phi_{13,t} + \alpha_4 \ln \phi_{23,t} + \alpha_5 \ln Z_i + \alpha_6 \ln \phi_{12,t} \times \ln FDI_{i,t} + \alpha_7 \ln \phi_{13,t} \times \ln FDI_{i,t} + \alpha_8 \ln \phi_{23,t} \times \ln FDI_{i,t} + \mu_{i,t} \quad (15)$$

其中, i 代表地区(省份), t 代表年份,下标 2、3 分别代表东盟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Z_i 为 i 地区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汇率(Exc)、劳动力禀赋(Lab)、资本禀赋(Cap)和人力资本(Hum)以及地区特征虚拟变量(dum); ϕ_{ij} 为各省与东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 $\mu_{i,t}$ 为残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为 2002-2008 年期间全国 28 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UNCTAD)、国研网以及中经网等。研究中使用的外汇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东盟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GDP(美元现价)和贸易数据来源于 UNCTAD,各省进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各省 GDP、实际 FDI 数额、高校教师数、总人口数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年末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9),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单豪杰(2008)。单豪杰(2008)的资本存量数据只有重庆市和四川省合并数据,在本文研究中我们根据各地 GDP 占两地区 GDP 总值的比重乘以总的资本存量来计算该地区的资本存量。具体变量处理如下:

(1) 贸易自由度

间接贸易自由度是衡量区域间开放度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该方法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中得到广泛的使用(Bosker and Garretsen, 2010)。相比较仅使用进口或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 GDP 的比值而言,该方法更能全面地反映贸易开放度。

$$\phi_{ij} = T_{ij}^{1-\sigma} = \sqrt{\frac{E_{ij}E_{ji}}{E_{ii}E_{jj}}} \quad (16)$$

其中 E_{ij} 表示本国对他国的出口, E_{ji} 为他国对本国的出口 (即本国的进口额), E_{ii} 为本国的 GDP, E_{jj} 为全球其他国家 GDP。在本文的研究中各省对东盟 (ASEAN) 整体的贸易自由度 (ϕ_{12})、各省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 (ϕ_{13}) 以及东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 (ϕ_{23}) 是我们计算的数值。

(2) 其他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引起计量的偏差, 本文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一些常见的控制变量: 地区劳动力禀赋、资本存量以及地区人力资本以控制地区特征。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之上, 本文研究中控制这些变量能够更好地处理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对 FDI 以及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劳动力禀赋数据我们使用中经网中年末从业人员数据作为代理变量, 资本禀赋数据使用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 (单豪杰, 2008), 人力资本数据使用区域高校教师数与区域总人口的比值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3.3 内生性与 GMM 估计

如果估计式 (14) 中所有的解释变量相对于被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进行面板 OLS / GLS 估计。但是, FDI 与贸易之间具有强内生性, 两者有着相似的影响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 (Pfaffermayr, 1996)。由于 FDI 和贸易有着很强的内生性, 这就需要寻求工具变量解决这一问题。然而, 在现有的研究中通常都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这与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内生性问题难以处理有着直接的关联。近年来经济学中控制性分析方法逐步增多, 但是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还是很难的。本文研究的数据为“宽横截面, 短时间序”, 除内生性外数据具有异方差等特征, 相比较而言系统 GMM 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Roodman, 2009)。

3.4 数据描述

图 1 为 1985-2008 年期间各省 FDI 与出口贸易的散点图, 从散点图来看, 随着 FDI 的流入增加, 进口贸易总额从最初的增速平缓到快速增加。需要注意的是, 在 1985-2008 年期间, 中国经历了经济特区的发展、南巡讲话以及加入 WTO, 促进了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安虎森和颜银根 (2011) 研究表明中国大量 FDI 的流入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以及贸易自由化有着直接的关联。由此, 我们推测 FDI 流入和贸易自由度是形成这种非线性特征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 表 1 列出了本文研究相关变量的观察值数、均值、标准差、最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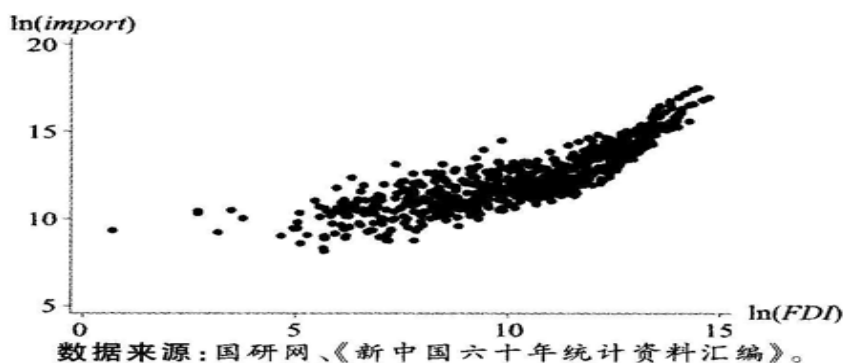


图 1 1985 - 2008 年期间各省 FDI 流入与进口贸易的散点图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X	196	2908595	5982116	32808	40000000	万美元
FDI	195	342324.2	446615.4	2043.992	2512026	万美元
ϕ_{12}	196	0.0057771	0.0093353	0.000142	0.038469	比值
ϕ_{13}	196	0.0089332	0.0132322	0.000499	0.063011	比值
ϕ_{23}	196	0.1100974	0.0072758	0.099265	0.118884	比值
Exc	196	7.8663	0.4777339	6.9669	8.2772	RMB/USD
Lab	196	2417.711	1465.081	282	5835.45	万人
Cap	196	3792.799	3604.304	162.41	16997.5	亿元
Hum	195	142.0133	108.8965	31.9899	689.999	人/万人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UNCTAD)、国研网、中经网以及作者自行估计,统计软件为 Stata11.0。

4 计量结果

本文计量软件为 Stata11.0,文中给出了静态面板(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动态面板(差分 GMM 以及系统 GMM)估计结果。为研究贸易自由化与 FDI 流入对地区进口贸易的共同效应,我们重点研究两者的交互项。此外,为说明在贸易自由度较低时 FDI 的流入可能对进口贸易产生负向的影响,在模型(3.1)-(3.6)中我们根据各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的大小重新分组。

4.1 静态面板估计

表 2 给出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静态面板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3)-(1.6)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模型(1.5)-(1.6)增加了交互项。根据 Hausman 检验,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中分别选择了模型(1.1)、(1.4)和(1.5)。模型(1.5)中 $\ln \phi_{23}$ 和 $\ln Exc$ 在中国各省份之间是相同的,加入时间控制变量后因存在共线性而被省略掉。

表 2 静态面板估计(全国分省份样本)

	(1.1)	(1.2)	(1.3)	(1.4)	(1.5)	(1.6)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n FDI$	0.0240526	0.04589131	0.01706706	0.04408211	0.55936233 ***	0.57864502 ***
$\ln \phi_{12}$	0.10035468 **	0.12470811 ***	0.05189182	0.12364842 ***	0.50333619 ***	0.34195299 *
$\ln \phi_{13}$	0.78037589 ***	0.88517669 ***	0.61934225 ***	0.87325314 ***	0.17975488	0.26814754
$\ln \phi_{23}$	1.7971708 ***	1.3240688 ***		-0.55973192		-2.7345046
$\ln Exc$	-3.2734367 ***	-2.5677598 ***		-2.738313 ***		-2.661594 ***
$\ln Lab$	0.05333185	0.24340848 ***	-0.04196642	0.1911756 **	-0.09271031	0.17396054 **
$\ln Cap$	-0.108535	0.09950733	-0.48415826 ***	0.0924701	-0.5456635 ***	0.03515572
$\ln Hum$	0.16202914	0.02824695	-0.09393005	-0.08679911	-0.08465326	-0.06681852
$\ln FDI \times \ln \phi_{12}$					-0.0455946 ***	-0.0280402
$\ln FDI \times \ln \phi_{13}$					0.05249035 **	0.06207862 ***
$\ln FDI \times \ln \phi_{23}$					0.23585992 **	0.152566
常数项	26.00246 ***	25.283533 ***	20.842704 ***	16.179558 ***	23.395937 ***	24.596675 ***
观察值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Adj. R^2	0.9456	0.9527	0.9583	0.9574	0.9639	0.9638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注:*, **,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从估计结果来看,FDI 只是在加入了贸易自由度与 FDI 的交互项之后显著为正。在模型(1.1)和(1.4)中 FDI 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各省与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水平($\ln \phi_{12}$)的提高促进了本省的进口贸易,而在模型(1.5)中本省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度($\ln \phi_{13}$)的提高对本国进口增加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明显。这从侧面说明了本省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未必能够促进本国进口额的增加,很有可能是取决于本国与区外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度是否达到一定水平。控制变量劳动力禀赋、资本禀赋以及人力资本禀赋对进口贸易几乎不产生影响。人民币升值与进口贸易有着反向关系,并且十分显著,这与以往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相同。

从模型 (1.5) 中我们发现, 贸易自由度和 FDI 的交互项影响显著。其中, $\ln FDI \times \ln \phi_{12}$ 的系数显著为负, 而 $\ln FDI \times \ln \phi_{13}$ 系数显著为正, 这就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 FDI 的流入抑制了各省进口贸易, 而各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以及 FDI 的流入促进了各省进口贸易。在命题 1 中我们指出, 如果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突破某个“临界值”之后, FDI 流入将导致中国从东盟的进口贸易减少。由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东盟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完全对称的关系,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刚好是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的对称面。因此如果命题 1 成立的话, 那么这就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可能已经突破临界值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尚未突破临界值,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 FDI 的流动将会替代进口贸易。

4.2 动态面板估计

表 2 从静态面板角度研究了贸易自由度、FDI 等与进口贸易的关系,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 本文贸易自由度等与进口贸易存在着内生性的问题。为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我们选择动态面板估计, 包括 Arellano 和 Bond (1991) 提出的差分 GMM 估计和 Arellano 和 Bover (1995) 以及 Blundell 和 Bond (1998) 提出的系统 GMM 估计。但是, 如果因变量和内生自变量类似于随机游走, 那么差分 GMM 将面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 GMM 则不通过差分后的方程估计参数, 同时通过堆积数据来保持原始数据和差分数据, 具有观察值数据翻倍、不存在差分后数据缺失等优点。

表 3 给出了 Arellano 和 Bond (1991) 提出的差分 GMM 估计, Arellano 和 Bover (1995) 以及 Blundell 和 Bond (1998) 提出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模型 (2.1) - (2.3) 使用差分 GMM 估计, 其中 (2.1) - (2.2) 使用贸易自由度以及 FDI 的一阶滞后 ($L1. \ln FDI$) 作为工具变量, 模型 (2.3) 增加 FDI 的二

表 3 动态面板估计 (全国分省份样本)

	(2.1)	(2.2)	(2.3)	(2.4)	(2.5)
估计方法	Arellano 和 Bond (1991)			Arellano 和 Bover (1995)	
	差分 GMM			系统 GMM	
$\ln FDI$	0.08957749	0.05639357	-0.00948481		
$L1. \ln FDI$	0.0060218	0.00552464	-0.00478614		
$L2. \ln FDI$			0.01499071 **		
$\ln \phi_{12}$	-0.07076964 ***	-0.06282011 ***	-0.02897421 **	-0.06336603	-0.08933712
$L1. \ln \phi_{12}$	-0.01984507 **	-0.01606606 **	-0.05044416 ***	0.04348017 *	-0.00023007
$\ln \phi_{13}$	0.84496334 ***	0.93401105 ***	0.96368989 ***	-0.35309234	-0.27865247
$L1. \ln \phi_{13}$	0.01639259	0.01113741	-0.00164587	-0.01974308	-0.0402019
$\ln \phi_{23}$	0.50207553			6.6069137 ***	7.0283033 ***
$L1. \ln \phi_{23}$	-0.08913318			-0.11363002 *	-0.24563353 *
$\ln Lab$	-0.01838129	-0.01689282	-0.00615073	0.01319326	0.0272439
$\ln Cap$	0.14914533 ***	0.18353812 ***	0.19694819 ***	0.05797477	-0.02173106
$\ln Hum$	-0.05163806 **	-0.08164452 ***	-0.07741153 ***	-0.030666	0.03915691
$\ln Exc$	0.29438296 **			0.11255156	0.03753629
$\ln FDI \times \ln \phi_{12}$	0.08553779 ***	0.08427964 ***	0.08297475 ***	0.00252243	0.00888147
$\ln FDI \times \ln \phi_{13}$	-0.07127929 ***	-0.07646904 ***	-0.0789335 ***	0.02226404	0.01918963
$\ln FDI \times \ln \phi_{23}$	-0.02799842	-0.01844315	-0.04077548	-0.5488508 ***	-0.56032213 ***
常数项	-2.8236627 ***	-2.5075406 ***	-2.7068434 ***	10.617828 ***	11.387786 ***
观察值	111	111	111	166	166
AR(1)				0.02088683	0.00060381
AR(2)				0.82983592	0.78608623
Sargan - P 值	0.3815	0.5344	0.8452	0.59390773	0.42793984
Hansen - P 值				0.10470592	0.5206703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注: *, **,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阶滞后 ($L2. \ln FDI$) 作为工具变量。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 Sargan-P 值大于 0.1, 即模型中贸易自由度以及 FDI 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模型 (2.4) - (2.5) 使用系统 GMM 估计, 贸易自由度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系统 GMM 估计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AR (1) 对应的 P 值小于 0.05 而 AR (2) 对应的户值大于 0.05; (2) Sargan 检验户值大于 0.1。在存在 FDI 项时, 采用系统 GMM 无法满足条件 (1)。

此外, Hansen 检验表明本文研究中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模型 (2.4) 和 (2.5) 中并没有加入 FDI 项是设置合理的。在模型 (2.2)、(2.3) 和 (2.5) 中我们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 FDI 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是不定的, 估计结果也不显著。与表 2 中明显不同的是 $\ln FDI \times \ln \phi_{23}$ 的系数发生了变化, 差分 GMM 估计中不显著而系统 GMM 估计比较显著。也就是说, 东盟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度的增加以及 FDI 的流入抑制中国进口的增加, 当然, 这并非本文关心的重点。系统 GMM 估计中 $\ln FDI \times \ln \phi_{13}$ 的系数仍然为正, 这与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只是并不显著。

4.3 贸易自由化水平、FDI 与进口贸易

在命题 1 和命题 2 中我们指出只有在地区间贸易自由度比较大时 FDI 的流入才会促进本地进口额的增加。表 4 中我们分别给出了全体样本、高贸易自由度样本以及低贸易自由度样本 Robust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的结果。根据核密度估计的层次聚类, 我们选择了 ϕ_{13} 是否大于 0.01 作为判断标准。表 4 中模型 (3.1) - (3.3) 采用 Robust 估计, 模型 (3.4) - (3.6) 采用系统 GMM 估计。从检验结果来看, 系统 GMM 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对内生性的解决也是合理的。我们给出 Robust 估计结果只是为了做比较, 并无他用。

表 4 不同贸易自由度的样本估计

变量	(3.1)	(3.2)	(3.3)	(3.4)	(3.5)	(3.6)
	Robust			系统 GMM		
	整体样本	$\phi_{13} < 0.01$	$\phi_{13} > 0.01$	整体样本	$\phi_{13} < 0.01$	$\phi_{13} > 0.01$
$\ln FDI$	0.46294457	0.90756188	-0.38556191	1.0817728 ***	1.1830084 ***	0.13594487
$\ln Lab$	0.17842009	0.19610433	0.26389437 **	0.58911843 ***	0.82253075 **	1.6525052 *
$\ln Cap$	0.02279191	-0.02384126	0.19063561	-0.78292602 ***	0.07142313	-0.51294744
$\ln Hum$	-0.00439493	-0.04606193	-0.10994088	0.49798737 ***	-0.30567671	0.8478723 **
$\ln Exc$	-2.3226268	-0.99507386	-4.3464803	-2.918207 ***	-1.1022815 *	-3.9376688 *
$\ln FDI \times \ln \phi_{12}$	-0.00158079	-0.00153985	-0.01061644	0.01119538 **	-0.00147903	0.06445598 *
$\ln FDI \times \ln \phi_{13}$	0.08063 ***	0.08311359 ***	0.07836721 ***	0.07551392 ***	0.14404663 ***	-0.00493028
$\ln FDI \times \ln \phi_{23}$	-0.03782572	0.16383775	-0.30858971	0.09468751 ***	0.05914432 *	0.05528145
常数项	15.594602 ***	13.480892 **	21.112272 ***	14.173737 ***	7.7567057 *	14.438799 *
观察值	194	137	57	194	137	57
AR(1)				0.00003563	0.00011	0.00093171
AR(2)				0.33735263	0.94813735	1
Sargan - P 值				0.0908746	0.11219425	0.10961512
Hansen - P 值				0.36188519	0.48405042	0.5040756

注: *, **, *** 分别为 10%、5%、1% 显著性水平, 计量软件为 stata11.0。

从表 4 估计结果来看, FDI 对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 但在贸易自由度比较大的时候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 $\ln FDI \times \ln \phi_{12}$ 、 $\ln FDI \times \ln \phi_{13}$ 以及 $\ln FDI \times \ln \phi_{23}$ 的系数变化值得重点关注。从模型 (3.4) 中可以看出三者的系数均为正, 而且十分显著。但是, 如果细分不同的贸易自由度水平, 则会发现在贸易自由度比较低时和贸易自由度比较高时系数出现正负号的变化, 这与我们的命题是一致的, 即贸易自由化后 FDI 流入可能替代或者增加出口贸易。表 4 中模型 (3.5) - (3.6) 我们主要考察 ϕ_{13} 不同组别值时 $\ln FDI \times \ln \phi_{13}$ 对进口贸易的大小。在 ϕ_{13} 比较小时, $\ln FDI \times \ln \phi_{13}$ 系数为正; 而在 ϕ_{13} 比较大时, $\ln FDI \times \ln \phi_{13}$ 系数为负, 这与我们的命题 1 是完全一致的。

劳动力禀赋对进口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贸易自由度比较大时这一影响尤为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劳动人口同时作为消费者, 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增加地区劳动力对国外消费品需求会增加。这就说明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为何出现大量美国货、欧洲货、日本货以及韩国货等涌入中国。在贸易自由度比较大时, 本地资本禀赋充裕的地区, 产品本地生产替代大量的进口产品。人民币升值更利于本地进口, 表 4 中 $\ln Exc$ 的系数为负, 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模型 (3.4) - (3.6) 证实了本文研究的经验假说,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 FDI 流入是否会导致本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加主要取决于本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度、本国与第三国的贸易自由度、东盟与第三国的贸易自由度、本

国劳动力数量以及本国资本存量等。

5 评述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FDI 的流入是否替代进口的增加,转而本地市场更多的依靠新迁入的外资企业提供产品?或者 FDI 的流入增加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而增加了进口?本文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并没有从这些角度来考察 FDI 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中国 FDI 与进口贸易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恰逢中国市场开放,地区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高。因此,本文首先建立了三地区、两部门和两要素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理论研究指出 FDI 对本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甚至会取决于第三国与本国贸易伙伴的贸易自由度。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 2002-2008 年期间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表明,FDI 与进口贸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当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突破某个“临界值”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 FDI 的流入将会替代进口贸易。

Baldwin 等(2003)在研究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政策时提出了贸易自由度,这种贸易自由度中包含了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等因素,可以说明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本文研究中使用 Head 和 Mayer(2004)提出的间接贸易成本作为贸易自由度的替代变量。根据前文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会降低中国的进口贸易。但是如果能够同时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化水平,则完全可以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增加,FDI 的流入将与进口贸易成为互补关系,从而有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作者: 颜银根 安虎森

来源:《经济评论》2011 年第 4 期

贸易强国视角下的流通产业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贸易大国并不等于贸易强国,“大而不强”等一系列老问题依然存在。2010 年 4 月,商务部提出到 2030 年要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分两步走:在 2020 年前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在 2030 年前后,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

贸易强国的基础是产业,贸易强国一定要以产业的强势竞争力为基础。加快流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构筑贸易强国的坚实基础。流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要形成充满活力的流通产业,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启动市场,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实力,从而加快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步伐。

1 流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贸易强国是指出口商品和服务中高级生产要素含量高、以价值型贸易为主体、能够在国际贸易中

获得主要利益的国家或经济实体。一国成为贸易强国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体现：(1) 经济高度发达，GDP 总量和人均 GDP 位于世界前列；(2) 货物贸易规模大，服务贸易发达，对世界贸易影响力强；(3) 对外开放程度高，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4) 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较强的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5) 掌握出口商品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拥有一批属于本国的跨国公司和一批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品牌；(6) 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惯例的制定和修改，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2010 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量 30 年间增长了 105 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与其他贸易强国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具体表现为：(1) 贸易增长方式相对粗放，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有超过一半是加工贸易。(2) 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自有品牌和营销网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还比较少。(3) 出口产品层次偏低，不少产品仍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不高；(4) 尚未形成一批管理水平高、综合实力强、能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企业。

自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流通产业发展便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十五”期间，流通产业稳步发展，市场规模继续扩大，有效拉动了内需，扩大了消费。同时，随着现代流通方式的推广和加速，流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得到较快发展。

“十一五”期间，2006 年商务部公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以建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商务发展新格局为总体目标，加快发展国内流通业，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大力提升市场功能，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2007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呈现下滑趋势，甚至连续 10 个月负增长，许多产业趋同导致产能过剩，需要进一步调整流通产业结构。2009 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回暖，我国流通产业开始逐步复苏。2010 年，商务部发布的《2009/2010 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9 年我国批发零售业逐步回暖，全年批发零售业投资额同比增长 39.4%，比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7.6%，虽然较上年有所下降，但比 2009 年上半年高 2.6 个百分点；住宿餐饮业加速结构调整，全年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6.8%；经济型酒店、大众化餐饮等低端市场发展迅速；拍卖业、典当业等特殊行业发展趋于活跃。

随着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由《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增加值统计数据可以得出，2006-2009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维持在 42% 左右，2009 年略有攀升。目前，我国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基础产业，第三产业的基础性作用得到逐步发挥。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显得尤为重要。

流通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2006-2009 年的产业增加值可以看出，尽管流通产业在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略有降低，但仍然占第三产业产值的 45%。

在“十二五”开始之际，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较大，我国流通业发展面临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流通产业结构急待调整和优化，从而进一步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流通产业的概念来看，广义的流通产业指商品所有者一切贸易关系的总和，我国进出口商品从属于流通产业这一范围，流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商品的定价权、渠道网络的控制权，进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和贸易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并间接影响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而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加强我国流通业国际竞争力，因此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将推动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2 我国流通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问题

流通产业结构是随着生产、消费、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流通领域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流通业结构的优化也推动着生产、消费、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演变,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先导因素。

流通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指的是流通运行中各种要素的比例关系和经济联系,属于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通产业结构的类型一般包括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业态结构、规模结构、空间网络结构、商品市场结构及其派生的经营方式组合结构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调整逐步完善,国有经济以及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得到充分发展。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暴露了我国流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百业复苏时期,为流通产业提供了一个自我检测的平台,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目前,我国流通产业结构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2.1 流通产业行业结构失衡,物流行业发展不足。

流通产业的行业结构包括纯商业结构(批发、零售、批零兼营)、餐饮业结构、商业服务业结构、售后服务修理业结构、物流配送业结构。其中,纯商业是我国传统商业,在我国流通中所占比重较大,其结构发展得较为完整:改革开放后,餐饮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流通产业的支柱之一。物流与商流的协调发展,是流通产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物流业是继劳动力、资本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其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虽然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已经初具规模,但内在质量较差,物流环节衔接不畅,物流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不高,这些因素导致物流运作成本较高,效益不佳。

首先,在科学技术支持下,物流配送的时间和效率有所提高,但配送在我国的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仍然面临进展缓慢、设备落后、信息化程度低的状况,其具体表现为:配送规模较小,物流网点仍然没有统一布局,乡镇地区配送效率普遍低下;配送中心现代化、机械化程度低,物流技术水平整体比较落后,不能广泛运用发达的交通设施;配送中心功能不健全,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加工和利用,距离信息化还存在一定差距,等等。其次,售后服务修理业仍需进一步提高。在汽车和家电行业售后服务修理中,由于竞争过于激烈,经销商们为求生存,不断加大降价优惠幅度,采取“先卖后谋利”的营销手段,通过售后修理谋取暴利。许多家电行业面临不能履行服务承诺、维修网点难找、服务标准不规范、维修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

2.2 新兴业态发展缺乏管制。

在电子商务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无店铺经营业态得到广泛发展,电视购物、电话购物、邮购、网上商城已经深入大众生活。从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的结构变化看,按照业态划分,网购形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按目前网购上升速度与超市、专卖店和其他业态下降的速度计算,前者上升的幅度将超过超市、专卖店和其他业态,最终形成网购、团购等新兴业态比重超过超市、专卖店等传统业态比重的格局。这些新兴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将逐步进入成熟期。例如,2010 年初开始陆续出现的团购网站,是继淘宝网等网上商店之后又一兴盛的行业。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 年中国网络团购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0 年 8 月底,国内初具规模的网络团购企业数量已达 215 家。与之前商家对客户(B2C)模式的网购相比,团购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且消费时间更为灵活。但由于团购网站大多采取预付款形式结算,团购消费者群体松散,消费者个体能力弱小,消费者很难依靠个体力量来防范风险,客户实际消费服务体验也得不到充分保障。

无店铺业态由于不需要租赁门店,所需投资成本相应较低。由于开店门槛较低,监管不健全,这

一业态结构还很不成熟。对网上商城、团购投诉客户进行的调查发现,无店铺业态目前存在商品质量不能保证、买卖双方缺乏信任、中间商只承担部分风险甚至不承担风险等问题。因此,急需相关政府部门的规范和引导,建立一个相对标准的平台来进行资质及信用等级划分,通过自上而下信用的建立,完善市场结构,增加消费者信心。

2.3 流通产业规模结构的不平衡性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通组织规模结构呈现出非均衡发展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大型化,造成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另一种是一些流通企业规模呈小型化发展趋势。流通业技术要求低、投资少、进入门槛低的特点,促使下岗人员、竞争力较弱者纷纷涌入流通领域。大量小商业资本盲目扩张,商业企业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导致了流通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和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破坏。小型企业成为经济生活供应系统的主体,显然不能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盲目扩张与小型化使商业组织结构朝两极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就我国宏观结构而言,流通产业是先导产业。从 2009 年三大行业的占比看,我国产业重心序列仍然是“二三一”,第三产业仍然处于第二位。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流通产业发展会大大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但是,我国流通产业尚不具备规模优势,就流通产业微观规模而言,以连锁企业为例,我国还没有能与国外家乐福、沃尔玛抗衡的大型超市。在流通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市和北京市,有物美、华联等本土超市类企业,尽管数目很多,但规模普遍较小。然而,流通企业作为服务型企业,单体扩大存在一个规模临界点,超过这个点,规模扩大反而会导致效益降低,因此流通企业的规模效益主要通过连锁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受我国流通企业自身实力及体制性障碍等因素影响,大多数没有采用连锁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规模优势不能发挥,一方面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再加上流通业管理水平低下,大多未开发出具有特色的经营模式,商品筹集、业态选择、促销、服务、店面设计等基本雷同,无法满足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导致集群效应无法实现。目前,国内大中小型企业各自为阵,企业间无法实现战略联盟与资源共享。

2.4 流通产业空间结构失衡,东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较大。

流通产业结构中市场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直接相关。城市在发展初期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企业,整个社会的资金和购买力大量集中于城市,加之城市商业设施、商品品种、价格等方面优势,使得从空间结构上看,城市流通发展迅速。自 2005 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流通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0%,但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数据计算得出,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占全部居民消费水平的 40%,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占 16%,而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仅占 13%。不同的区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也较大,其中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为 2.91,中部地区为 3.03,西部地区差距最大,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为 3.74。

城乡流通体系发展差别巨大,2004-2008 年市级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一直保持在 70%左右,县及县以下地区所占比重没有突破性进展。虽然 2009 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迅速增长,且增速超过城市,但 1997-2007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突破一万元大关。据统计,200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31:1,2009 年扩大到 3.33:1,绝对差距由 11020 元扩大到 12022 元。2011 年 1-2 月春节期间,城乡消费市场之比为 4.82:1,城乡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商品进不来、出不去的“围城”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2.5 流通产业技术结构失衡,传统技术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视流通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忽视技术开发与运用。目前我国商业企业基本还未形成自动化信息网络,在物流等部门,操作工具还停留在传统的叉车等设备上,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偏低。而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早已显示出技术密集型特征,其技术升级过程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点。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自动售货规模扩大;70 年代,许多流通环节采用了计算机技术;80 年代,电子数据交换技术(EDI)、供应链管理技术得到广泛应用;90 年代以后,出现了运用因特网(Internet)的电子商务技术。我国流通产业技术结构迫切需要改善。

3 调整流通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演变是许多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过程中,流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流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会提高第三产业产值,还会增加我国外贸额度。调查研究发现,居民消费水平、投资需求水平、工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与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而与信息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显著负相关。流通产业结构变动受诸多因素影响,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流通产业结构现状、变动趋势和规律,为科学制定流通产业政策、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流通产业发展、推进贸易强国进程等提供依据。

3.1 推进流通产业政策与制度创新,为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制定详细的流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和政策,继续推进流通产业政策与制度创新,为实现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在制定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充分认识到了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及其竞争,才能真正显示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才能通过市场价格差异所引起的对投资者和生产者的鼓励,使社会经济资源按照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及时有效流动。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经济环境,政府只有在市场力量被证明无能为力时才采取行动。宽松的经济环境促进了美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综合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专业的运输与仓储服务商和区域性配送服务商等分工合作的产业形态,促进了流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因此,我国应加快推动流通产业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包括:彻底打破流通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为流通企业公平竞争与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制定企业兼并、联合的法规,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并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资产重组与优化;妥善解决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出现的债务与职工就业安置问题,加速流通产业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完善市场竞争规则,规范企业竞争行为,特别是对企业无形资产给予充分保护,以促进知识型流通企业发展;加强对流通领域进口商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流通领域进口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

3.2 建立流通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制度,因地制宜地制定流通行业结构规划与方案。

流通业国际化使商业企业面临出口外贸的机遇。一方面,大型供销商纷纷进军海外市场,在国外开办商店,在国外采购商品;另一方面,各国又在较大程度上向国外开放本国市场。商业企业经营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业经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国,还有很大比重在国外市场进行;企业运行机制、制度规范与国际市场相一致;国内流通领域充分实现对外开放。因此,应健全外贸流通企业和大中小型流通企业审批制度,确保各流通行业大型商业企业数量与进出口额度、购买力水平、消费结构及城市规模相适应。又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同,各地区在流通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深入研究各地区流通行业结构所面临的问题,充分考虑各地区的需要和可能,按照各行业流通企业数量适度、规模适度、布局与结构合理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规划,并配合有关政策来引导商业网点合理发展。

3.3 提高流通产业国际竞争力, 发展多种业态结合的业态模式。

以零售业为例, 在 2009 年全球零售企业 100 强中, 单一业态所占比例不足 1/3, 而实施多业态经营的占了 2/3 强。不同的业态是流通产业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和选择的结果。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全球流通业进入市场时所进行的业态选择就会有所不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生活的多元化, 导致购买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 进一步促进了流通业态的创新。新型商业业态一方面采用现代流通方式, 重新考虑商业站在市场前沿, 信息多、信息变化快、信息繁杂的特点以及准确定位市场信息的重要性, 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处理和传递信息, 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与效率, 提高信息精确度与集约度, 提高企业市场反应能力, 获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性; 另一方面, 采用最新科学技术, 使用自动销售技术、快速补货技术、先进的库存管理技术和物流配送技术等, 以最低的成本、最快速的管理反应、最优的服务进行经营运作, 取得了极大成功。

业态的相互融合使得一些业态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 甚至很难分辨。从世界范围来看, 传统百货商店所占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萎缩, 取而代之的是连锁超市、大卖场等新兴业态, 而现代化购物中心和网上购物将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对于无店铺业态, 顾客往往热衷于一时, 最终因无店铺的信用和客服质量无法保证, 仍然选择店铺式销售, 这对无店铺业态发展无疑会形成某种制约, 毕竟店铺往往能代表公司实力, 给顾客以诚信放心的感觉。虽然《直销管理条例》中明确取消了店铺数量、标准等方面的限制, 提出了服务网点的新概念, 但店铺经营仍然是直销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 鉴于无店铺业态所孕育的商机往往大于有店铺业态形式, 顾客可随时查看所需商品, 因此发展多种业态相结合的模式, 可有效弥补各单一业态的缺陷, 促进流通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3.4 加快企业集团化建设, 优化流通产业规模结构。

目前, 国内流通企业规模普遍小而分散, 不足以与国外大型商贸企业竞争。应借鉴发达国家流通组织、流通模式, 结合我国现有流通方式, 打破地区界限, 加快企业集团化建设, 以提高集约化程度与流通效率。政府在推进集团化的过程中, 应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 在进行资产重组的同时, 以适度规模增长为原则, 采取产业催化政策, 这种政策包括压力催化、利益催化、协调催化。

我国在进行企业集团化建设的同时, 还可推行自愿连锁联盟, 将无数的小规模企业进行整合, 降低甚至取消地域性市场壁垒, 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参股、战略联盟、人员互派、技术和信息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形成稳定的企业关系, 减少企业之间的摩擦成本, 实现“双赢”。流通企业还要与各种供应商通过供应链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 把传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上升为企业结合体或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弱化竞争风险。关于自愿连锁联盟, 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美国和日本流通产业为代表发展起来的自愿连锁联盟,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比如, 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国际独立零售商联盟 (Independent Grocers Alliance, 以下简称 IGA) 是美国最大的自愿连锁组织, 在欧美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 在 40 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 店铺总数 4000 多家; 日本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自愿加盟者计划, 其最大的自愿连锁企业 K 公司于 1987 年正式成立了自愿连锁经营形式, 当时已有 1015 个加盟店, 年销售额达 1250 亿日元, 成为日本最大的自愿连锁组织。

3.5 建立多渠道流通体系, 优化流通产业空间结构。

创新城乡流通体系, 协调城乡流通产业, 是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农村流通的发展能有效缓解流通产业空间结构的失衡, 缩小东西部地区与城乡流通的差距。近年来, 国家为促进农村流通业发展, 先后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 但没有很好地形成农商产业链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应扶持一批大型流通企业做大做强, 支持一批特色商品交易市场集群的发展, 发展一批规模大、标准化、有品牌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一批现代化的物流园区, 积极推动流通主体参与网上交易, 完善绿色流通环境。

建立多渠道的流通体系,促使城乡流通产业协调发展。农产品流通渠道多种多样,如近两年来商务部推行的“农超对接”就是一种。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仅仅是“农超对接”,还包括生产企业+农产、批发企业+农户、零售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产、农产品协会(农产品技术协会)+农户、农产品合作组织+农户、配送+分销等多种渠道,目前有 70%左右的农产品通过批发市场渠道进入各类渠道终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壁垒,坚持城乡互动原则,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

3.6 加快流通产业技术创新,进一步优化流通产业技术结构。

为实现流通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最优配置,防止技术创新的中断,确保流通产业技术持续进步,我国必须采取适当的产业技术政策对流通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进行有效的指导、组织、扶植与协调,但国家对流通产业发展的信息引导也需要流通产业自身具有非常高的信息化水平。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施流通产业技术政策创新:(1)确定流通产业技术的发展目标和具体计划,包括:指定各种具体的技术标准和技術发展规划,公布重点发展的核心技术和限期淘汰的落后技术项目清单。

(2)制定流通技术促进政策,包括:制定和完善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给予资金支持的政策,如设立流通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流通企业技术创新担保基金、流通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适应流通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技术支撑体系,如设立为流通企业服务的科技服务机构、制定鼓励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与流通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的政策;建立完善流通技术创新政策与法规体系,为流通企业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作者:龚晓菊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11 年第 4 期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 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1 企业物流风险的成因与征兆

1.1 企业物流风险的成因。

企业物流风险是指企业物流系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对企业预期目标的影响。企业物流风险包括企业行使物流职能、组织物流活动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如企业作为所加工、存储和运输的货物的货主,面临着货物在物流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坏灭失的风险;作为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人,面临着这些资产可能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而损毁的风险;作为物流服务的采购方,面临着由于物流服务商违约而带来的各种风险;作为货物买卖合同的签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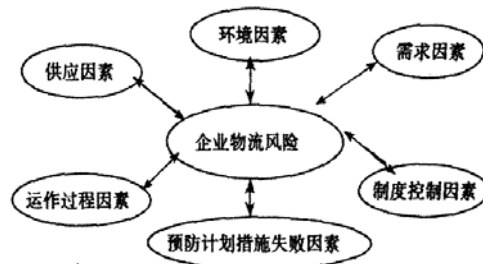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物流风险的成因

方,面临着由于交货不准确、不及时带来的违约责任风险,等等。参照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对供应链风险因素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企业物流风险的成因不外乎需求因素、供应因素、运作过程因素、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以及预防计划措施失败因素。如图 1 所示。

企业物流风险的成因一是需求因素。需求因素是来自于企业物流系统下游的风险因素,通常是指与潜在的或实际销售相关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网络发生的风险因素,是存在于企业物流系统和市场的连接之中,尤其是过程、控制、资产和企业物流系统下游基础设施的独立及企业调整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依赖于少数大客户,因促销而难以预测的需求大幅波动,重要需求交货期的改变,重要需求满足率的改变,多数不可预测的季节性需求波动,客户财务状况恶化,频繁、快速的新产品上市,客户忠诚度很低和客户意见保留等。二是供应因素。供应因素是来自于企业物流系统上游的风险因素,它来源于上游企业在提供的产品、信息方面所存在的潜在和实际的不确定性。包括依赖于少数没有候补的关键供应商,部分供应商财务不健全,供应商交货期长,供应商质量问题,计划安排和供应订货完成恶劣,供应市场生产能力短缺,缺乏债务管理措施,低质量供应商计划和预测等。三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来自于企业物流系统之外的不可控因素。从企业自身看是不可控的事件,这类风险因素通过它的供应商和客户或直接影响企业物流系统的运作表现出来。包括污染、动力供应中断、风暴洪涝、火灾、罢工、产业政策调整等。四是运作过程因素。运作过程因素通常是指物流系统运作过程引发的物流配送的延迟,甚至导致供应物流中断的不稳定因素。物流活动的执行依赖于企业物流系统功能,一旦物流系统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就会造成数量和质量水平的波动,从而产生风险。运作过程因素包括产量低于预期,生产质量标准低于市场可接受水平,未能采用足够的手段处理采购的质量和精确度,系统故障和备份预防经营失败,企业不能用及时有效的方法响应客户的需要,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等。五是制度控制因素。制度控制因素通常是指控制物流系统运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系统和程序步骤,包括订货量、批量大小/批次,安全库存政策,资产和运输管理的政策、制度和程序,财税和财务制度,环境政策法规等。六是预防计划措施失败因素。缺乏对不可控因素的抵御措施和预警计划本身也会成为一种风险。企业物流风险准备措施的关键考验是平时有一套合理的风险管理计划,能正常识别物流系统运作发生的风险并有正确的措施应对。

1.2 企业物流风险的征兆。

企业物流风险的基本征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流成本失控。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物流成本失控是企业物流系统可能发生风险最主要的和最显著的征兆。因为物流绩效的最直接反映是完成特定运作目标所发生的成本。其中包括的内容很多,突出表现在企业的物流费用居高不下、物流总成本的大幅波动、物流成本销售比例的失衡等等。企业物流成本的失控,极易导致物流系统的崩溃和企业经营的失败,它是企业物流最显著的风险信号,企业必须层层设防,严密监控相关成本指标的变动。二是物流运作效率明显低下。物流运作效率低下,体现在企业物流资产回报率、物流资产周转率、库存周转率、呆滞商品比例、配送车辆运转率、物流资产价值、物流附加值、订单处理速度、货物处理速度、仓库利用率等资产利用水平、盈利能力以及生产率等一系列指标上。虽然企业一定时期物流系统运作效率低并不会在短期内马上导致较大的物流风险,但较长一段时期内企业物流系统运作效率低下,就说明企业物流系统逐步丧失其应有的功能,正在步入不断衰退的境地,面临较大的物流风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客户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客户服务是对物流系统在创造产品的时间效用和空间效用方面的有效性的一种衡量。客户服务水平不仅决定了现有的客户是否会继续保持成为客户,而且也决定了有多少潜在的客户会变为客户。因此,客户服务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物流系统运作的成败,客户服务水平明显下降也就说明了物流系统面临较大的风险。客户服务水平下降体现在企业物流服务的时间、质量、可靠性、安全运送、信息沟通和便利性(灵活性)等一系列指标上。四是物流管理制度混乱。企业一定时期物流管理制度的混乱和物流控制能力的低下,往往是一个企业物流系统失败的重要原因。企业物流管理制度混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为缺乏科学的物流战略计划和有效的物流组织;缺乏部门物流管理责任制度;缺少有效的物流成本和费用控制制度;缺乏适宜的采购制度

和科学的库存政策；没有适用市场突变的应变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缺少高效的物流信息传递系统和反馈机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物流管理制度的混乱必然会导致物流系统运作的失控，带来物流风险。五是物流运作环境明显恶化。企业物流运作环境的明显恶化，往往是导致企业物流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但许多企业物流管理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当然从宏观上讲，国家的金融、财政、税务、利率和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客户消费倾向的变化等等，都可能对企业物流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这里研究的是企业微观物流环境发生变化对企业可能产生物流风险的影响，如与本企业有重大关联企业的破产、企业的市场信誉下降、金融机构对本企业采取更严格的贷款条款、企业无法获得客户应有的信用政策、信誉结算无法实施、筹资环境恶化、债务和担保纠纷不断等。这些运作环境的恶化，往往是企业物流走向风险的重要征兆。

2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

2.1 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的关系。

在供应链环境下，企业物流系统的有效运行是由供应链上所有的成员企业共同保证的。因此，物流风险预警模式由单一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模式转变为多企业协同物流风险预警模式，预警管理职能从企业内部物流风险预警管理扩展到企业间物流风险预警管理，物流系统运行情况将取决于构成供应链的所有企业的物流管理与控制水平。供应链环境下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将比单一企业内物流风险预警机制复杂得多。供应链管理执行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物流的计划与控制等功能，它涉及的范围较广，但自始至终都贯彻了协调管理思想。从原材料采购到售后服务过程中环环相扣的协调保证，使合作企业之间建立了相互的信任，供应链才有了构建的根基。而供应链管理从整体出发进行全面的优化控制，与供应商实现信息的共享与集成，加强了企业间的沟通协作，为实施物流风险预警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实施平台。同时，供应链管理对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的功能和范畴作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延伸。它在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企业供应链的建设和管理，从而全面、经济地提高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水平。因此，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包括双重含义：供应链中所有成员参与物流风险预警及对供应链物流全过程实施风险预警管理。

2.2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的特征。

不同部门由于物流战略不同而有不同的风险预警目标，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目标不仅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更是一个系统，具有一个目标体系。在供应链物流战略指导下制定出企业物流风险预警的总目标，然后针对企业的组织机构及各项物流活动对此总目标进行分解，从而得到一个树状的目标体系图，正是这样的目标体系将企业所有部门的物流风险预警活动整合于一个总目标。同时，该目标系统具有开放系统的特性，同企业供应链大环境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流。此外，企业物流风险预警的范围也从单一企业拓展到了供应链网络群体的总体物流风险预警。

2.3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的构成。

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是企业物流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事前监测和控制企业物流风险的一种监管办法。风险预警机制一般包括风险组织机制、风险信息收集和传递机制、风险分析机制和风险处理机制。因而，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机制也应包括四部分，即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组织机制、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信息收集和传递机制、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分析机制和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处理机制。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预警组织机制。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组织机制是整个风险预警机制的主体，在整个风险预警机制中起着组织和决策的中枢作用，是建立整个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因此，为使整个风险预警机制的功能得到正常、充分的发挥，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基于供应链

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组织机制。该组织的成员由涉及供应链主要成员企业和本企业物流系统各环节的有实际经验的资深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从不同领域、角度对供应链物流系统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具有一定权威的建议。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组织相对独立于企业的组织体系,独立开展工作,但不直接干涉企业物流系统的运作,它只对供应链主要成员企业和本企业最高管理层负责。在建立风险组织机制时,遵循“专人负责、职责独立”的原则,确保物流风险预警工作能够有人落实,且不受其他组织机构的干涉和影响。风险组织机制的建立可以使企业物流风险预警工作经常化、持续化,进而产生预期的效果。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信息收集和传递机制。这是整个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整个预警机制要能够有效预知物流系统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预先防范风险的发生,就必须建立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信息收集和传递机制,及时收集和传递导致或可能导致各种风险因素的信息,抓住每一个风险征兆。所要收集和传递的信息资料包括供应链主要成员企业和本企业物流系统的运作状况数据,外部市场、行业等供需数据以及影响本企业物流系统运作的自然环境信息等。同时,要使这些数据形成一个信息系统,而且这个系统的信息要不断刷新、升级,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分析机制。这个风险预警机制的核心和关键,是发挥着物流风险的监测和诊断功能。通过风险分析机制,将监测的实际值与预警值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企业物流系统运作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并将其以数值形式表示。同时,根据跟踪发现的异常情况,运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诊断技术进行分析判断,估计不同风险的大小,评价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确定企业物流系统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根源所在,并视企业物流风险状况发出不同的预警信号。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处理机制。企业物流风险处理机制是整个风险预警机制的目的和归宿。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物流风险处理机制是根据整个风险预警机制实施过程中提出的信号显示,分别不同风险类别采取的解决和消化物流风险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的总称。其目的是将可能出现的损失减至最小,避免崩溃现象的发生。企业物流风险处理机制应包括应急计划、补救办法和改进方案等。其中应急计划主要是指针对物流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破坏,应采取何种手段去规避,控制事态进一步恶化;补救方法主要是针对物流风险程度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减少损失,将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改进方案主要是改进物流系统运作中的薄弱环节,杜绝和避免类似的风险再度发生。

作者: 刘永胜 王燕

来源:《经济问题》2009 年第 9 期



基于可研报告的公路 BOT 项目 投资风险快速分析

技术经济及管理



BOT 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进入了我国市场。此后, BOT 方式在北京京通快速路、广深高速公路、湖北襄荆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对我国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BOT 投融资方式”在我国也称为“特许权投融资方式”, 其定义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通过特许权协议, 授予投资人承担公共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 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 项目公司拥有投资建造设施的收费权; 允许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费用, 由此回收项目投融资、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特许期届满, 项目公司将设施无偿地移交给签约方的政府部门。

对于投资人而言, BOT 项目成功的关键是如何识别、评价及控制项目的风险。在项目决策阶段, 投资人必须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盈利能力分析是项目评估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何在盈利能力分析中充分进行风险控制是项目决策成败的关键。

在目前的公路 BOT 项目初步评估实践中, 一般以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为基础进行项目筛选。但由于可研报告在编制目的、研究深度上不同于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 其预测和分析的精度往往无法满足投资决策的要求。如不对可研报告研究结论细加审核和测算, 势必对项目投资造成很大风险。例如, 东部某公司管理的 17 条收费公路中, 其中 8 条收费公路车流量仅能达到可研报告预测数据的 60%, 而极个别的项目公路车流量仅达可研报告预测量的 9%。

本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从公路 BOT 项目风险分析出发, 结合项目投资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的区别, 详细阐述了如何对可研报告研究结论进行判断分析, 合理控制风险, 快速获得满足投资评估需要的基本信息, 并引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 为公路 BOT 项目投资评估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参考。

1 可研报告中需要识别的主要风险

1.1 主要风险内容

从投资评估角度看, 可研报告中需要识别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工程风险和政策风险。

(1)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调整等, 给项目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通行交通量、收费标准以及收费收入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2) 工程风险

工程风险是指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或其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工程方案变化、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和工期拖长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3) 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指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政策调整,项目原定目标难以实现的可能性。政策风险主要表现在收费期、收费标准、有关规划、税费、利率和征地拆迁成本等变化。例如国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可能对信贷政策和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对利率和征地拆迁成本造成影响。

1.2 主要风险来源

要实现公路 BOT 项目风险的快速有效分析,首先需要确定风险的来源。对此,可以通过把握可行性分析和项目投资评估的区别来对风险来源加以识别,主要包括 4 个内容。

①项目性质:可研报告一般按照政府收费还贷公路编制,转为 BOT 方式投资后,项目性质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导致收费期、税率、费率等变化;②研究深度:可研报告一般直接利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公路网规划等政府编制文件中的数据,这些规划往往由于编制时间早、主观意愿强等特点,与实际客观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③研究精度:可研报告编制中一般须严格遵循国家颁布的有关方法和参数,这些方法和参数能满足宏观决策的需要。但项目投资评估针对的是特定区域的特定项目,需要进行微观分析和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参数取值;④研究重点:可研报告往往是从政府决策角度出发,国民经济评价的地位高于财务分析,因此报告中财务分析相对比较粗略。而项目投资评估从投资人的收益和风险角度出发,盈利能力和风险分析是核心内容。

2 风险快速分析的要点和方法

2.1 主要思路

可研报告进行风险快速分析主要侧重于盈利能力方面的风险识别,因此,本文主要分收入侧和支出侧论述风险快速分析的要点和方法。

2.2 收入侧风险控制

(1) 交通量

可研报告交通量预测基于现状交通调查,一般采用 4 阶段法预测,采用的方法是通用的,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其主要风险是可研报告在参数取值和路网假定条件上可能存在与实际不符情况。

①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的 GDP 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是交通量增长速度预测的核心指标。可研报告通常直接采用地方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的经济规划指标,而经济规划指标的制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的主观意志,在实施中还可能变数。项目评估中必须充分注意其取值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进行适当调整是非常必要的。②路网条件的变化:项目交通量预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是路网条件。如果在预测时遗漏了竞争性道路、对竞争性道路项目建成通车时间估计偏晚、或者对竞争性道路收费标准调整估计不足,都可能导致项目交通量预测值偏高。可研报告往往以各级政府的公路网规划为依据确定未来路网,但这些公路网规划一般每 5 a 编制 1 次,有些情况甚至间隔更长,而实施中规划又不断被调整,如果照搬公路网规划,很难把握未来路网的真实形态。因此,项目评估中必须综合公路网规划和实际公路建设情况,才能估计出比较客观的路网条件。③基年交通量及来源构成:这是项目未来交通量预测的最基础数据。可研报告中往往进行大篇幅的描述和论证。鉴于可研报告编制时间往往比项目评估早得多,项目评估可利用最新年份的交通量统计数据核实,并尽量到现场进行典型断面的交通量观测。④通道交通量:可研报告按照四阶段法逐步进行交通量预测。在风险快速分析时,无须对这些步骤全部核查,可通过项目通道构成、通道交通量构成等的分析,判断项目交通量预测值的合理性。⑤运营初期交通量预测值:BOT 项目运营初期的交通量对于项目总体盈利能力影响显著,同时对于项目的还款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项目评估中需要高度重视。但可研报告中,运营末期的交通量水平(决定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是研究者更为关心的重

点,运营初期交通量预测值准确性往往重视不足。因此,项目评估时必须对可研报告的运营初期交通量预测值进行严格审查,进行必要的修正。⑥运营期调整:可研报告一般按照政府收费还贷公路编制,而 BOT 方式投资公路为经营性收费公路,一般来说,后者的收费期要比前者长,有利于投资人获得更多的收益。项目评估时需要充分考虑项目所处区域(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最长收费年限不同)、投资人竞标的激烈程度、当地政府可能批准的收费期等因素,合理估计项目运营期(即收费期)。⑦大修年份收入调整:大修年份由于施工影响,往往当年的交通量和收费收入都有大幅下降。多数可研报告在编制时未充分考虑这种影响,在项目评估时需加以考虑,避免高估收入。

(2) 收费标准

一般情况下,交通出行需求对于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的弹性较小,因此,作为投资人一般希望收费标准越高越好。可研报告在收费标准取值上一般以财务分析指标能达到审批要求为原则,客观上讲,其研究深度一般不深。但对于投资人来讲,在项目评估阶段必须尽量落实收费标准,否则整个决策缺乏依据。为此,需要注意:

①仔细研究项目所在地方的平均收费标准,以及收费标准的审批原则和习惯。由于我国各地在项目建设成本、交通量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各地的收费平均水平也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各地政府在收费标准的审批原则和习惯上也略有不同。项目评估时必须充分注重项目的地区性差异,估计合理的收费标准。②收费收入的计算方式也存在地区性差异。一般来讲,收费收入是收费交通量与收费标准及行驶里程的乘积。但随着联网收费的发展,不少省份以联网收费总额为基数,按照各项目所占收入比例进行拆分,但拆分方法往往有所不同。多数省份原则上以某项目通过的车公里数(收费交通量部分)与收费标准的乘积占总收费额的比例计算该项目的拆分比例,但也有部分省份在确定拆分比例上还需考虑该项目投资额占全路网总投资额的比例。③收费收入计算的合理性。收费收入计算中,一般采用的收费交通量是全线平均交通量,全程收费价格采用项目里程与收费标准的乘积,考虑到实际收费价格存在“不足 5 元按 5 元取整”的习惯,这种算法相对保守,因为少数行驶里程少的车辆计算收费低于 5 元,而实际收费为 5 元。但总体来说,这种算法是合理的,毕竟高速公路上的出行一般都在几十公里以上。但有部分可研报告采用相邻互通间的收费交通量与相邻互通间的收费价格计算收费收入,同时采取“不足 5 元按 5 元取整”的方法调整收费价格。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 1 次出行分为数个短距离出行,再采用较高的收费标准计算收费收入,夸大了收费收入,在项目评估中需要特别注意。

2.3 支出侧风险控制

(1) 建设期支出

建设期支出是公路 BOT 项目现金流中最大、最集中的现金流出,控制建设期支出的风险在项目投资风险控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建设期支出主要需要注意:

①严格核查工程量:一般而言,可研报告对工程量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由于研究深度限制,对于地质、水文等情况难以完全摸清,导致实际施工时沿线遇到未知的不良地质等情况,造成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的变化,使工程量增加、施工难度加大、施工成本增加。项目投资评估时需要注意工程量是否算足,对可能存在的不良地质、水文条件是否充分估计,采取适当保守的原则有利于规避风险。②取费标准更新:近年来,我国在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贷款利率上调整幅度较大。可研报告一般编制时间相对较早,在项目评估时要注意更新调整,以更加符合实际建设成本。③单价更新及物价上涨费调整:近年来,公路建设的中劳动力、材料等市场价格上涨较快,项目投资评估时需要相应更新。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 1996 年来,可研报告投资估算中不计物价上涨费,因此,绝大多数可研报告投资估算不考虑物价上涨费。但近年来的价格上涨趋势反映出短期内主要材料的价格还将上涨,在项目评估时应考虑物价上涨费,以尽量反映项目投资建设的实际支出情况。④工期调

整：有些可研报告在编制时，考虑到规划安排和行政因素，可能尽量缩短工期。项目投资评估时，应深入分析前期准备工作、施工组织与施工技术、资金是否能按期到位等因素，确定合理工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建设成本。

（2）运营期支出

运营期调整和利率变化影响运营期支出，因此在运营期支出风险分析中也需要考虑。除此以外，还需关注如下要点：

①运营成本核查：可研报告在养护、管理、大修等运营成本取值上经常参照一般的经验，对于项目的具体特点有时分析不够。项目评估时一定要充分考虑项目的自身特点，如自然条件、交通水平以及结构物状况等，对运营成本进行详细核实。②还款方案：有些可研报告针对政府还贷项目的特点，在还款方案上采取了“有多少还多少”的方式，即当年有多少现金节余额，则按相应金额进行还本付息。按照这种还款方案，有时在运营初期连利息都不能足额偿还。按照 BOT 方式，这样的方案显然是无法满足提供贷款的银行的要求，使得项目在融资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项目投资评估时，要对可研报告的还款方案加以分析判断，进行必要的调整。③税费调整和运营期调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费还贷公路可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但经营性公路则需缴纳。鉴于可研报告一般按照政府收费还贷公路编制，在项目投资评估时，要按照经营性收费公路的性质考虑相关税费。同时，由于运营期限的调整所引起的各项费用的增加也应足额计入。

3 案例分析

本文以某高速公路投资项目为例，说明如何以可研报告为基础进行风险快速分析。

3.1 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我国华北，拟按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该项目全长约 101 km。为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业主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人，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中标的投资人，由该投资人以 BOT 方式投资、建设和运营该项目。鉴于招标周期的限制，投标人必须根据可研报告进行风险快速分析。

3.2 风险快速分析

（1）收入侧分析

① 交通量

该项目可研报告按照政府还贷公路性质编制，收费期为 20 a。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招标公告及项目情况，投标人按照 25 a 收费期进行交通量预测。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路网条件发展情况、基年交通量、通道交通量等综合分析，投标人发现 2 个主要问题。一，可研报告中项目交通量高于通道交通量，显然存在交通量预测值偏高的可能；二，根据最新综合运输规划，拟建项目附近将并行建设 1 条煤炭专用运输铁路，对拟建项目交通量将造成分流。项目评估针对上述问题对交通量进行了计算和调整，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交通量调整
Table 1 Adjusted traffic volume 辆·d⁻¹ (标准小客车)

类别	2011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35 年
可研报告	13 060	20 095	28 184	42 722	
投资评估	9 234	15 134	20 758	32 363	37 834

② 收费标准

可研报告采用收费标准为 0.50 元/(车·km)(标准小客车), 但根据调查, 当地同类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为 0.45 元/(车·km)(标准小客车)。考虑到最近时期以来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基本保持不变, 项目评估将 2011 年收费标准调整为 0.45 元/(车·km)(标准小客车)。

(2) 支出侧分析

① 建设期支出

可研报告投资估算为总投资 62.9 亿元。项目评估针对可研报告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通过现场察看项目沿线的地形条件, 结合当地类似地形条件下的项目工程数量, 采用经验判断, 对项目工程数量和投资估算进行调整。结果发现: 一, 全线桥梁增加; 二, 全线隧道有所减少; 三, 全线土石比例有偏差; 四, 近期材料价格上涨且在建设期内将持续上涨、银行年贷款利率提高。根据上述情况, 调整后的总投资为 65.4 亿元, 增加了 4%。

② 运营期支出

可研报告采用运营期为 20 a, 项目投资评估时根据项目性质的改变将运营期调整为 25 a, 并相应预测运营期支出。可研报告采用的利率为 6.84%, 项目投资评估时根据评估时利率调整为 7.56%, 运营期财务费用相应增加。

可研报告采用一般经验数据预测项目的运营费用, 养护、管理和大修费用分别为 8、16 和 180 万元/km(每 10 a)。项目评估发现, 可研报告没有充分考虑项目所处地形、气象等特点, 结构物状况, 以及当地经济水平, 总体取值偏低。项目评估据此调整养护费用为道路 10 万元/km, 特长隧道运营养护费用按其隧道机电设备费 10%计; 管理费用为 13 万元/km; 道路大修费用为 250 万元/km(每 7 a), 特长隧道大修费为其隧道机电设备费(每 9 a)。另外, 可研报告对运营费用未来增长率按年增 2%考虑。项目评估时考虑到项目交通量增长较快的特点, 按年增 3%调整。可见, 运营期项目的运营费用在可研报告中也大大低估。可研报告因项目性质为收费还贷公路, 根据有关规定可不计营业税和所得税。但项目评估时, 该项目已改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 为此, 应该计入营业税和所得税。

表 2 项目评估快速风险分析要点(案例分析)

Table 2 Main analysis items of rapid risk for a BOT project (case analysis)

项目	预可报告	投资评估
收入分析		
2011 年交通量 /(pcu·d ⁻¹)	16 060	9 234
2030 年交通量 /(pcu·d ⁻¹)	42 722	32 363
收费标准	0.5 元 /km (小客车)	0.45 元 /km (小客车)
支出分析		
投资估算 /亿元	62.9	65.4
银行贷款利率 /%	6.84	7.56
养护费用 /km	8 万元	道路 10 万元, 特长隧道运营养护费用按其隧道机电设备费 10% 计
管理费用	16 万元 /km	1 280 万元 /a(约 13 万元 /km)
大修费用	180 万元 /km (每 10 a)	道路 250 万元 /km (每 7 a), 特长隧道大修费为其隧道机电设备费 (每 9 a)
运营费用年均增长 /%	2	3
税费 (营业税和所得税)	免	不免
盈利能力分析		
财务内部收益率 (融资前) /%	6.23 (20 a 收费期)	3.48 (20 a 收费期), 5.02 (25 a 收费期)

③ 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快速风险分析, 投标人对项目盈利能力进行了重新分析, 测算得到该项目在 25 a 收费期情况下的融资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5.02% ; 而 20 a 收费期情况下的融资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仅为 3.48% 。反观可研报告的研究结论, 20 a 收费期情况下的融资前财务内部收益率达到了 6.23% , 比项目评估的财务指标高出许多。可见, 可研报告在项目盈利能力判断上偏乐观, 如不对其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 盲目决策, 势必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该项目针对可研报告进行风险快速分析的要点如表 2 所示。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投融资模式日趋多样, 按照 BOT 方式建设的公路项目越来越多。深入研究公路 BOT 项目的风险分析, 对于投资人意义重大。本文为公路 BOT 项目投资决策者和投资评估人员提供一种基于可研报告的投资风险快速分析的方法。作为公路 BOT 项目的研究者和决策者, 有必要全面理解政府编制可行性研究与投资人实施项目评估在目的、程序、内涵上的区别, 这样有利于深入认识风险源, 灵活运用风险分析方法, 提高项目风险快速分析的能力。本文从公路 BOT 项目风险分析出发, 阐述项目投资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的区别, 特别是从项目成本构成、效益计算以及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如何根据可研报告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判断和防范风险以及如何快速获得满足投资评估所需要基本信息的方法, 并结合案例说明了如何应用这种方法。文章提出的方法和结论可为公路 BOT 项目进行科学而迅速地决策提供参考。

作者: 张世文 刘小明

来源: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A” 型会计人才实验教学效果分析及启示

——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

会计学



1 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1.1 国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特色的探讨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研究的课题, 从国外知名大学到国内知名院校乃至普通地方高校都有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模式, 如斯坦福大学的目标是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 哈佛大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有教养的人为目标, 强调培养的人才是在感情和智力方面全面的人, 应该受过广泛而深刻的教育,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批评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度发展的人才; 麻省理工学院将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要培养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具有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以及与人合作的能力, 并且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世界的 21 世纪的工程领袖; 剑桥大学在其学生手册中称剑桥

培养的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在未来能够改变科学道路的杰出人才,而牛津大学则立足于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等。

1.2 国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国内知名大学如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引领社会主义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各行各业未来领军人才;清华大学致力于培养具备高尚的健全人格、宽厚的业务基础、敏捷的创新思维、厚重的社会责任、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潜在的领导能力,将来能够对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通过上述国内外知名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可以看出这些国内外知名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各有特色。对于地方高校,如何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会计人才,成为会计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否准确及培养方案的设计是否科学,对于未来会计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人才培养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2 “A”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理论分析

2.1 “A”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

我校前身是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 1983 年 5 月,2004 年 5 月升为二本院校更名为宁波工程学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本科会计学专业,根据宁波经济发展对会计专业人才规格的需求以及我校工科院校特点,确立了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会计专业人才既不是理论研究型的,也不是技能培训型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能把会计准则转化成会计实践并能进行会计管理的专业人才。即毕业生主要面向工商企业、金融企业、市场中介机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其相关部门,从事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和审计等方面工作,担任企业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以及服务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师。在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定位基础上,培养的毕业生就是具有系统的会计、信息、运筹、管理、经济、法律等知识,具备较强的会计核算与分析、财务管理与投资理财、审计与税收筹划等方面的能力,具有工程素质的应用开发型的会计管理人才。就是通过四年本科教育,本专业应打造出一批“A”型会计师,即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并具备工程素质(Adaptability)的应用开发型(Applicability)高级(Advanced)会计师(Accountant)。使本专业成为宁波会计师的“摇篮”。那么,我校提出的会计本科学生“A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否实现了当初的培养目标定位,是否能培养出具有未来能够成为高级会计师应有的身心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技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人才从而切实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本文首先对我校“A”型人才培养模式内容进行阐述,然后对我校毕业的 2005、2006 级会计专科毕业生(未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跟踪调查数据和我校毕业的 2004、2005 级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跟踪调查数据从社会认可、用人单位评价、自我评价等方面作出汇总比较,最后对调研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并对“A”型人才培养模式做出效果评价。

2.2 “A”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理论阐述

通过四年本科教育,本专业打造出一批“A”型会计师,一是其基本含义由四个 A 开头的英文单词组成,其组成图标像个“A”字,如(图 1)所示;二是指在我校“知行合一、双核协同”人才培养模式下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素质的会计师。其具体内涵有以下方面:(1)专业性(Accountant)。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即会计师(Accountant)。会计师不仅要精于会计实务,而且要科学认识会计实务的理论基础。毕业生经过一段实践能胜任各种行业和企业单位的会计工作,胜任各种会计职业工作。(2)适应性(Adaptability)。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Adaptability)。会计专业本科的毕业生

不仅要系统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具备从事本专业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会计环境的能力,学会如何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解决新问题。同时立足宁波市外向型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校工程特色,着力培养具有工程意识,强外语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会计人才。(3)应用开发性(Applicability)。应用开发性(Applicability)是人才培养的最主要特色。会计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离开会计实践,就很难准确的掌握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也就难以胜任会计工作。会计的应用型人才强调“高素质,强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核心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和社会实践能力。通过加强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方法和途径将实践教学理念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中。(4)高素质一贯性(Advanced)。具备了上述专业功底扎实、适



者。

应性强、具有创新和冒险意识的“高素质、强能力”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就有了将来成为会计职业界的高素质(Advanced)人才的潜质。培养的毕业生既能潜心从小事做起,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又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为将自身打造成“A”型会计师有意识地努力和准备着,直至到达“A”型的金字塔塔尖,成为会计职业界的佼佼者。

3 “A”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调查分析

3.1 调查方法与样本的选择

从提出“A”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历了六年时间,已有两届会计学专业毕业生,为了切实了解我校从2004年升本后在会计学专业本科生中实施的“A”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产生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培养出具有未来能够成为高级会计师应有的身心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技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人才;能否切实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带着这些问题针对2008年、2009年毕业的学生通过发放问卷并开展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追踪调研,调查的样本主要来自两类:一类是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2004级会计学本科87人及2005级会计学本科42人(以下简称A组),另一类是未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2005级会计专科81人及2006级会计专科121人(以下简称B组),最终发放本科问卷129份,回收118份,回收率为91%;专科问卷202份,回收177份,回收率87.6%。针对样本主要从社会认可、用人单位评价、自我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追踪调查并通过相关数据比较,做出分析与效果评价。

3.2 适应多变的经济社会需求能力(Adaptability)

调查分析对A组与B组学生的适应性做了调研与访谈,具体数据及统计结果见(表1)。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A组中表示对当前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高达95%,而B组中表示对当前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仅为55%;对于第二个问题,A组中三个月以内就适应新工作的比例为83%,而B组中三个月以内就适应新工作的比例为40%;对于第三个问题,A组中三个月以内就能熟练掌握发生变化的国家经济法律、金融政策、会计准则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比例为70%,而B组中三个月以内就能熟练掌握发生变化的国家经济法律、金融政策、会计准则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比例仅为25%;对于第四个问题,A组中有30%的同学对于科技创新及管理创新带来的财务管理工作流程方面的变化愿意无条件积极接受,不愿意接受改变的比例为零,B组中仅有5%的问卷并开展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追踪调研,调查的样本主要来自两类:一类是实施“A”型人才培

养模式的 2004 级会计学本科 87 人及 2005 级会计学本科 42 人(以下简称 A 组),另一类是未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2005 级会计专科 81 人及 2006 级会计专科 121 人(以下 B 组),最终发放本科问卷 129 份,回收 118 份,回收率为 91%;专科问卷 202 份,回收 177 份,回收率 87.6%。针对样本主要从社会认可、用人单位评价、自我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追踪调查并通过相关数据比较,做出分析与效果评价。

表 1 对适应多变的经济社会需求能力 (Adaptability) 的调查统计表

样本 问题	A 组				B 组			
您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满意 78%	基本满意 17%	不满意 4%	很不满意 1%	满意 25%	基本满意 30%	不满意 35%	很不满意 10%
您用多长时间适应了新的工作?	1 个月 35%	2-3 个月 48%	3-6 个月 12%	半年以上 5%	1 个月 15%	2-3 个月 25%	3-6 个月 42%	半年以上 18%
当国家经济法律、金融政策、会计准则等发生了变化您需用多长时间熟练掌握并应用到工作实践?	1 个月 30%	2-3 个月 40%	3-6 个月 25%	半年以上 5%	1 个月 5%	2-3 个月 20%	3-6 个月 50%	半年以上 25%
对于科技创新及财务管理工作的流程方面的变化,您愿意积极接受吗?	愿意无条件积极接受 30%	若改变能够带来工作上的便利会接受 60%	不喜欢改变但若工作需要会被动接受 10%	不愿意接受改变 0%	愿意无条件积极接受 5%	若改变能够带来工作上的便利会接受 55%	不喜欢改变但若工作需要会被动接受 30%	不愿意接受改变 10%

表 2 对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能力 (Adventure) 的调查统计表

样本 问题	A 组			B 组		
您参加工作后曾主动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过实际业务难题吗?	曾独立或与同事共同合作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过实际业务难题 60%	愿意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问题,但对自己业务能力没有信心,所以没有主动去寻找机会为用人单位解决难题 30%	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做过 10%	曾独立或与同事共同合作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过实际业务难题 20%	愿意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问题,但对自己业务能力没有信心,所以没有主动去寻找机会为用人单位解决难题 50%	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做过 30%
您善于发现所在单位财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吗?	会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发现所在单位业务工作中的问题 50%	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尚不具备发现所在单位财务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42%	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的业务工作中有什么问题 8%	会自觉运用所学知识了解并发现所在单位业务工作中的问题 10%	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尚不具备发现所在单位财务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70%	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的业务工作中有什么问题 20%
当您发现所在单位存在的财务问题时您会大胆地提出来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如果在工作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 40%	如果在工作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但不一定能给出建议 50%	虽然在工作发现问题但若不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自己没有主动提出免得自找麻烦 10%	如果在工作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 10%	如果在工作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但不一定能给出建议 30%	虽然在工作发现问题但若不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自己没有主动提出免得自找麻烦 60%

3.2 适应多变的经济社会需求能力 (Adaptability)

调查分析对 A 组与 B 组学生的适应性做了调研与访谈,具体数据及统计结果见(表 1)。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A 组中表示对当前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高达 95%,而 B 组中表示对当前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仅为 55%;对于第二个问题,A 组中三个月以内就适应新工

作的比例为 83%，而 B 组中三个月以内就适应新工作的比例为 40%；对于第三个问题，A 组中三个月以内就能熟练掌握发生变化的国家经济法律、金融政策、会计准则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比例为 70%，而 B 组中三个月以内就能熟练掌握发生变化的国家经济法律、金融政策、会计准则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比例仅为 25%；对于第四个问题，A 组中有 30% 的同学对于科技创新及管理创新带来的财务管理工作流程方面的变化愿意无条件积极接受，不愿意接受改变的比例为零，B 组中仅有 5% 的同学对于科技创新及管理创新带来的财务管理工作流程方面的变化愿意无条件积极接受，不愿意接受改变的比例却达 10%。通过两组同学对“适应性调查”设计问题回答比例产生较大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实现了能够适应多变的经济社会需求的能力（Adaptability）的培养目标，而没有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不具备适应多变的经济社会需求的能力（Adaptability）。

3.3 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能力（Adventure）

调查分析对 A 组与 B 组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能力（Adventure）做了调研与访谈，具体数据及统计结果见（表 2）。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A 组中表示曾独立或与同事共同合作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过业务难题比例高达 60%，而 B 组中表示曾独立或与同事共同合作运用所学知识为用人单位解决过业务难题比例仅为 20%；对于第二个问题，A 组中表示会自觉运用所学知识了解并发现所在单位业务工作中的问题的比例为 50%，而 B 组中表示会自觉运用所学知识了解并发现所在单位业务工作中的问题的比例仅为 10%；对于第三个问题，A 组中表示如果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比例为 40%，而 B 组中表示如果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会主动向上级主管提出并给出建议比例仅为 10%，A 组中仅有 10% 的同学表示虽然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但若上级主管没有过问自己不会主动提出免得自找麻烦，B 组中则有高达 60% 的同学表示虽然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但若上级主管没有过问自己不会主动提出免得自找麻烦。通过两组同学对“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能力”设计问题回答比例产生较大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的能力（Adventure），而没有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在工作中缺乏一定的创新意识和驾驭风险的能力（Adventure）。

3.4 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Applicability）调查分析

对 A 组与 B 组学生是否具备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Applicability）做了调研与访谈，具体数据及统计结果见（表 3）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A 组中表示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乐于接受也会认真对待高达 45%，而 B 组中表示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乐于接受也会认真对待仅为 10%，这说明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毕业生能潜心从小事做起，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在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发现不同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共同的体会，差异不大，说明提出的“A”型人才要求的高素质都是用人单位希望应聘者所具备的；对于第三个问题，A 组中回答“以上优势都具备”的达 35%，而 B 组中回答“以上优势都具备”的仅为 5%；对于第四个问题，A 组中回答“以上能力都曾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的达 25%，而 B 组中回答“以上能力都曾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的仅为 2%。通过两组同学对“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Applicability）”设计问题回答比例产生较大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时比没有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根据近三年我校会计学本科生在浙江省教育厅举办的浙江省大学生财会信息化大赛的获奖统计数据显示，我校参赛的会计学本科生每年都获得三等奖、二等奖，特别是 2009 年大赛题目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校会计学专业本科生在激烈的决赛环节中表现突出，得到了决赛评委的高度评价，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本科竞赛题目发生变化后的第一次比赛，我校参赛队伍是宁波市所有高校参赛队伍中唯一获得一等奖的队伍，这进一步说明了会计专业“A”型人才培养模式同“适应财会信息化发展趋势，提高在校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的综合能

力,培养财会专业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相吻合,同时验证了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学生在竞赛中取得的成绩也充分地检验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

表 3 对是否具备较高素质(Advanced)和较强应用能力(Applicability)的调查

样本问题	A 组			B 组		
若应聘后,公司暂时让你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你乐意吗?你会认真对待吗?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乐意接受,也会认真对待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可以接受,但由于与所学专业无关,认为这是能应付过去就可了,不会花费太多心思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意暂时作一工作,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没意义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乐意接受,也会认真对待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可以接受,但由于与所学专业无关,认为这是能应付过去就可了,不会花费太多心思	应聘后若暂时作一些打杂的工作,意暂时作一工作,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没意义
	43%	50%	3%	10%	70%	20%
您认为,求职中哪些素质是用人单位比较看重的?	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扎实的会计专业素质、和谐的社会综合素质(包括上进心、协作能力和交际沟通能力)	健康的身心素质、人文修养、职场人可持续发展素质(包括熟练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创新意识、学习和驾驭风险等方面的能力)	以上素质都看重	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扎实的会计专业素质、和谐的社会综合素质(包括上进心、协作能力和交际沟通能力)	健康的身心素质、人文修养、职场人可持续发展素质(包括熟练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创新意识、学习和驾驭风险等方面的能力)	以上素质都看重
	33%	10%	53%	50%	10%	40%
您觉得在竞聘现在的职位时您具备的突出优势有哪些?	过硬的专业知识及取得的各种职业资格、职称、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	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团队协作、领导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以上优势都具备	过硬的专业知识及取得的各种职业资格、职称、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	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团队协作、领导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以上优势都具备
	43%	20%	33%	70%	25%	5%
您作为我校毕业生,有哪些平时在学校培养的能力受到了您所在单位的称赞好评?	专业知识过硬、英语及计算机水平高、道德品质好、工作态度好	实践能力强、沟通交往能力较好、团队合作意识强	适应能力强、能力应变能力强、自主学习能力强	专业知识过硬、英语及计算机水平高、道德品质好、工作态度好	实践能力强、沟通交往能力较好、团队合作意识强	适应能力强、能力应变能力强、自主学习能力强
	33%	25%	13% 23%	63%	25%	3% 2%

4 “A”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改进策略

4.1 开发“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

对于所设计的问题“相对于宁波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里学院,您觉得我校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会计专业人才有哪些优点和特色?哪些局限或弊端?这对您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有什么影响?”约 92% 的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体会做出了回答,但也有 8% 左右的学生表示对“A”型人才培养特色不清楚。这一方面说明“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还不够鲜明,除了应在新生入学的专业教育及后续课程学习中通过专业负责人讲解及任课老师的宣传引导让学生有意识的了解我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只有学生深入了解了专业特色及培养目标,学生才能真正理解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安排的目的,才能主动积极配合老师,在课程学习及安排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在引导下培养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而真正实现“A”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还需要所有的专业教师共同探讨、深入研究,进一步挖掘“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在课程建设上一定要充分体现确定的人才培养特色,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潜能,让课程建设真正成为沟通学校与教师及教师与学生的纽带及传递教育思想、观念、宗旨的中介。会计专业虽然已经有了《基础会计》省级精品课程、《中级财务会计》校级精品课程与《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三门校级重点建设课程,课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要清醒

地认识到我校的课程建设水平还不够高,还没有形成在省里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和特色的一流教学方法、内容与手段。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动态过程,涉及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只有紧紧围绕确定的人才培养特色,不断探索课程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才能真正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教师水平的发挥和提高。

4.2 深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平台、目标和形式

对于所设计的问题“您觉得我校会计专业的六个实践环节《感知实践》、《工商实训》、《文献检索》、《调研实训》、《学年论文》、《毕业实践》对您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所起的作用大吗?这些实践环节还需从哪方面加强?”高达 98%的学生认为这六个实践环节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同学们社会实践能力增强了同学们的团队意识、责任感;了解了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车间及从采购到生产、销售直至收回货款的经营过程,零距离接触了企业家、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财务经理、一般职员、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学生们通过工商实训到不同企业参加实际工作,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自身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文献检索实训同学们掌握了信息检索利用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培养了学生们动手实践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获取文献以及利用各种图书馆资源和网络学术资源的能力,同时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素质,为将来的进一步深造和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通过调研实训学生学会了如何针对所要了解的问题设计调查问卷、如何进行访谈,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更是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专业领域存在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素质,特别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但学生也表示了希望这些实践环节内容应更加充实,希望更多的老师直接参与指导这些实践环节的学习,希望将每年的浙江省大学生财会信息化大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等学科竞赛有效的融入到相应的实践环节中,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希望在老师指导下积极申报专门为支持和培育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学科竞赛是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创新教育的特殊形式和有效载体,也是对创新教育质量进行检验的良好手段。如何扩充现有实践环节的内容,如何调动教研室所有教师积极参与到与会计专业紧密相关的学科竞赛辅导中来,如何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课题研究中从而使得相关的实践活动水平更高是下一步要认真总结思考的问题,并随之进一步修订完善我们的“A”型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对毕业生的调研还发现,学生普遍渴望能有一个与企业环境接近的仿真模拟实验室,希望能增加综合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内容。虽然现在我校已建立有手工模拟实验室、ERP 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平台,但这些实验室及进行的实验内容多为验证性的内容并且完全独立,这不能够与目前的“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的一体化创新实践模式及“A”型人才培养目标很好的适应。会计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验基本技能、基本科学素养、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应不断更新会计实践教学理念,突出“A”型人才培养特色,以会计模拟实验为基础,会计信息应用为重点,将会计与财务、税务、审计融为一体,使得会计实验逐步向会计职业的其他应用领域拓展。如会计分析、预测、决策、纳税筹划,借助网络平台,采取网络与手工操作相结合方式,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集角色扮演和岗位体验于一身,以培养学生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3 打造具有特色的“三双三高”型师资队伍

提高教师的素质,首先要提高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包括知识更新要求在内的智力素质。我校会计专业通过内部人才培养及师资引进,师资队伍结构及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通过人才引进、教师进修、冗员分流等措施,培养和构筑“三双三高”型的教师队伍,为培养“A”型人才做好必要的师资准备。其中,“三双”是指“双师、双语和教学科研双方兼顾型”,可以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及宁波市财务经理人协会邀请企业的财务总监、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作为客座教授担任部分课程的部分讲

授,邀请知名财经院校的高级学者不定期的到我校开展专题讲座,可以通过加强与国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等措施采取灵活多变的政策解决双师、双语及知名教授短缺的问题,通过这种灵活的互动机制不断推动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进一步提高。“三高”则指“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准”,在引进和培养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的同时,推行重点课程负责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等制度,推动专业教学改革的不不断深化。

5 结论

我们调查比较的样本是未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专科学学生”和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本科学生”,“专科学学生”和“本科学生”之间由于学制和学习时间的不同在知识结构上本来就存在差别,这对比较分析会带来一些影响,在分析时已剔除那些明显是由于学制和学习时间的不同带来的差异因素,这样由于二者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不同,最终表现出的能力和素质上的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出有意义的效果评价。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需要对按照“A”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做好追踪调查并进行深入的人才培养效果分析评价。今后将继续做好毕业生追踪调查,一方面,通过利用校园网络平台建立毕业生质量调查网站网页,建立每一届会计学专业毕业生滚动式个人信息平台,创建快速、高效的调查与反馈手段对连续几届的同样实施“A”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本科毕业生进行纵向比较;另一方面扩大与宁波市兄弟院校的合作,以宁波市同类院校会计学专业毕业生为对象分别从社会认可、用人单位评价、自我评价等方面,对同类院校数据和我院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做出效果评价。通过建立自己学校纵向与宁波地区兄弟院校横向比较数据,对有关调查数据、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反馈,挖掘“A”型人才培养特色,验证“A”型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性、先进性。同时不断地完善培养计划,推进会计学专业教学及科研改革,发挥我校会计专业作为宁波市重点专业建设项目的领头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会计专业人才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姚丽琼 王菁华 梁旭雯

来源:《财会通讯》2010 年第 1 期(下)

“国际会计”课程教学之改进思考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会计的国际化 and 趋同化越显著。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会计本科培养方案”后,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在会计本科培养方案中提出了诸如“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内外会计、审计惯例”等的培养要求。而点击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知名招聘网站,则发现大多数的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的高级职位也都提出了类似要求。定位于国家间会计差异比较与协调的国际会计课程,责无旁贷应满足上述培养要求。因此,为顺应趋同化形势、满足人才培养需求,重新定位国际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就成为教学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1 “国际会计”课程的特点

作为会计学本科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课程,国际会计课程与其他会计专业课程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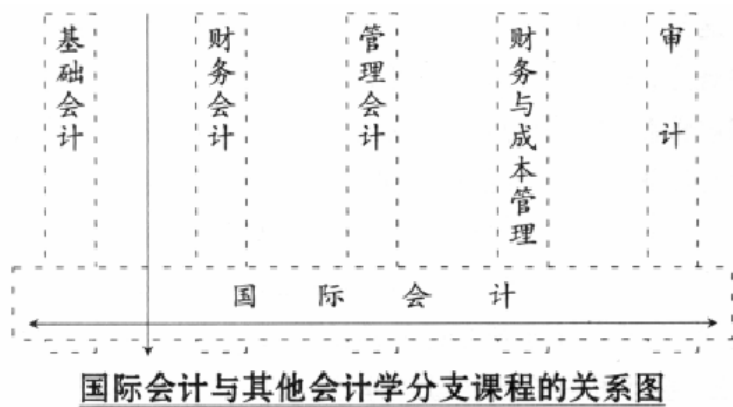
独特之处。崔和缪勒认为,国际会计把通用的、面向本国的会计在最广泛的含义上扩展到这几个方面:①国际比较会计;②跨国经营交易和跨国企业经营方式中特有的会计计量和报告问题;③国际金融市场的会计需要;④通过政治的、组织的、专门职业的和准则制定方面活动,对世界范围内会计和财务报告差异所进行的协调。根据上述观点,综合现有国际会计教材的目录发现,国际会计课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理论与实务并重。

纵观中外国际会计课程的教材,可以将国际会计课程所包含内容概括为:①国际比较会计;②协调化;③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确认与计量(主要涉及财务会计领域);④其他,如国际管理会计、国际财务管理、国际审计、国际税收、国际金融等。上述内容有些涉及比较会计、协调化等方面的理论阐述,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确认与计量方面的理论前沿,以及其他会计学分支在国际领域的理论延伸;有些还包含财务会计(如外币交易的处理、外币报表的折算、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等)、管理会计、审计等实务方面的内容。

1.2 与会计学分支有重合。

国际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同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它是更多会计的概念和实务上的延伸,涵盖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税法等课程的内容。该课程的内容与上述会计学分支存在着许多重合之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右图表示。考虑到会计的动态性,图中各门课程的内容都会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因此图中均采用虚线表示。



国际会计课程与其他会计学分支课程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于前者所涵盖内容是横向的,而后者则是纵向的。也即其他会计学分支课程大多是从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及方法的阐述出发,进而将其拓展应用到实务领域,如账务处理或计算分析等。而国际会计课程的内容章节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关系不明显,除包含自身特有内容的国际比较会计和协调化理论,其他多为图中会计学分支课程在国际领域的

延伸。

1.3 对英语的要求较高。

作为一门高校专业课程,国际会计产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几所大学。国际会计课程的代表性教材主要为:①美国崔和缪勒教授合著的《国际会计》;②英国诺比斯和帕克教授的《比较国际会计》;③李·H.拉德鲍和西德尼·J.格雷等的《国际会计与跨国企业》。国际会计领域及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因此,国际会计课程相对于其他会计专业课程来说,对英语的要求较高。此外,从国际会计课程的具体内容来看,在比较会计部分要深入了解各主要国家的会计准则与实务,就需要登录其相应的英文官方网站,如 FASB、SEC、ASB 等;在协调化部分要深入了解国际会计协调的最新进展,就要登录相应的致力于国际会计协调化的组织的官方网站,如 IASB、IFAC 等。要做到以上程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高要求。

2 国际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

在百度搜索后显示的会计学本科培养方案中,大多数高校将国际会计课程设置为高年级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时约为 40 个左右。在课程性质和课时条件的约束下,国际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既要满足培养方案所提出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内外会计惯例的学生”要求,又要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因此,国际会计的教学目标可概括为“使学生了解各主要国家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主要特点和差异,以及各国为会计国际协调所进行的努力和成果”。

具体教学目标可以包括如下内容:①掌握国际会计中的基本概念;②在了解主要国家财务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的基础上,能够对其进行比较并按会计模式加以分类;③掌握国际会计协调化的基本理论,了解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化和趋同化的组织、活动及成果;④学习部分国际会计准则,并了解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差异;⑤掌握相关的英文会计术语,能够阅读国际会计领域内的专业文献;⑥拓展专业知识面,补充国际会计课程的支撑知识,如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等。其中前四个目标是重点,后两个则是延伸或拓展。

3 国际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

无论是从国内外国际会计的专著和教材还是从有关国际会计的专题研究来看,国际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科所涵盖的内容仍处在探索之中。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会计的国际趋同也日渐深入,以此为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的国际会计课程亦相应调整。在国际会计产生之初,该课程重在対各国财务会计准则和实务进行比较和归类;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差异已不再是主流,会计的国际协调甚至是统一成为了重点。因此,国际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就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应的教学方法也应作出改变。

国际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及课时分配表

序号	教 学 内 容	课时
1	国际会计的总论:介绍国际会计的产生与发展、国际会计的概念等内容。	2
2	国际比较会计(上):介绍比较会计的基本理论、会计模式的定义、影响会计的环境因素、会计模式的分类等内容。	4
3	国际比较会计(下):介绍主要国家,如英、美、德、法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制度以及会计实务,重点把握其财务会计的特点。	4
4	国际会计协调化:介绍协调化的基本理论,包括协调化的概念、原因、作用、障碍,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化的组织、活动、成果及《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等。	6
5	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介绍该准则并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具体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4
6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汇率变动的影响:介绍该准则并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具体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4
7	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	6
8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4
9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介绍该准则并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具体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6

3.1 教学内容的改进。

考虑到国际会计课程的选修性质和课时的约束,该课程教学内容的改进以“轻差异、重协调”为原则。具体内容可列表如上: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内容以 40 学时为限,其中国际会计实务篇可选择更多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讲解。在选择时应考虑与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衔接,以先选修过的课程中未学习的准则,或与中国会计准则差异较大的准则为主。在可能的情况下,以专题形式介绍国际会计领域内的

管理会计、国际审计、国际税收等内容。

3.2 教学方法的改进。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对表中所列内容可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总体上可要求学生以分组学习 (TEAM WORK) 的方式进行该课程的学习。具体方法如下:

(1) 总论部分。

总论部分以教师讲授为主,重点帮助学生构建起国际会计课程的框架,使其理解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以及概念。

(2) 国际比较会计部分。

(上)部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为辅。教师重点讲授会计模式等种类基本理论,学生讨论中国的会计准则和实务可归属哪种会计模式,或者中国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提交研究报告;(下)部以学生自学为主,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堂演讲 (PREZATION),并进行随堂答辩,课后提交演讲报告。

(3) 国际会计协调化部分。

协调化的基本理论部分,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化的组织及其活动和成果”部分则要求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分别选择某个组织,收集资料并进行归纳,提交学习报告“;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部分,则可要求学生在教师讲授的同时阅读原版文件、翻译指定内容,并提交翻译稿。

(4) 国际会计实务部分的学习则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做一定的习题巩固学习效果。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考虑采用双语教学模式,既能全程使用,也能选择部分章节使用,如理论部分使用双语教学,实务部分则采用中文讲解。

3.3 考核方法。

根据上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国际会计课程的考核方法应作出灵活的调整。除一定比例的考勤和课堂表现分(如 15%)之外,对国际会计理论部分的考核可在期中进行,重点是评价学生所提交的中国会计模式选择的研究报告、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化的组织的活动及成果的学习报告和“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指定内容的中文翻译稿。具体评分时先对学习小组评出总体得分,然后根据小组内部的分工以及小组成员的表现分别给每个学生评分。对国际会计实务部分的考核则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试题题型主要以账务处理为主,测试学生对所学会计准则的掌握程度。国际会计理论与实务两部分可分别设置 35%和 50%的权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国际会计课时的分配以及考核权重的设置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具体的课时、考核等还取决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设定。

作者:丁俊

来源:《财会月刊》2011 年第 6 期(下)

保险资金投资于低碳行业的行为金融学分析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保费收入也不断增长,保费收入从 2001 年的 2112.3 亿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1.47 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以年均 36% 的速度增长。

保险资金的运用,要求满足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收益性是保险公司进行保险资金运用的主要目的。盈利能给保险人带来企业效益,增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2005 年至 2010 年,国内保险机构共实现投资收益 7201.2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超过 6%,基本满足了收益性的要求。安全性原则是保险资金运用的首要原则。因为保险基金是保险人对全体被保险人的负债。从数量上看,保险基金总量应与未来损失赔偿和保险给付的总量一致,若不能安全返还,必将影响保险企业的经济补偿能力。但是,从 2006 年开始保险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上升到 2008 年的急剧下降,说明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易受经济周期以及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这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要求提出了挑战。依据 2009 年数据,保险资金运用结构中债券占比 57.1%,占用资金最多;其次为银行存款,占比 26.8%;基金和股票联合占比不超过 15%,流动性强,易于变现,基本满足了流动性要求。但是,寿险期限较长,合同复杂,因此需要保险资金投资于长期资本资产项目,以满足将来偿付的需求;非寿险公司由于其大多为一年及以内的业务,需资金运用于短期项目。从我国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状况来看,由于缺乏具有稳定回报率的中长期投资项目,致使不论其资金来源如何、期限长短与否,基本都用于短期投资,期限匹配问题极为严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保险资金的良性循环和资金使用效果。根据保监会 2010 年 2 月 1 日公会审议通过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宽,对解决保险资金运用中的安全性及期限结构不匹配等问题有很大帮助。

鉴于此,在我国能源结构饱受诟病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产业符合社会需求,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由于低碳产业期初投资大,回收期长,技术不成熟,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很多中小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对保险资金运用而言,投资于低碳产业可以解决保险资金投资期限结构不匹配问题,为其运用提供了新渠道。目前,保险资金投资于低碳产业仍然主要通过传统方式——持有低碳企业的股票或债券来实现。目前我国低碳企业债券与普通企业债券可以说并无区别,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保险资金投资于股票的情况。

2 行为金融分析

2.1 决策者的一般特征

(1)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是经济人,市场行为是由物质动机驱动的,并且人们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是理性的并且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必然结果。在做投资决策时会对可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作出最优的决策,根据 NPV、IRR、ROI 等指标来判断一个项目的优劣。由于决策者是应变性的,会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的不同选择决策程序和技术。在投资于低碳行业时,会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来判断一个企业的未来收益,但更多的,由于低碳行业是新兴行业,保险企业会考虑低碳企业背后的政策扶持。其次,低碳行业初始投资大,回收期长,这恰好解决了保险资金运用不匹配的问题。但是由于低碳行业技术的不成熟性增强了未来不确定性,在做决策时保险公司会更注重这方面的因素,而把 NPV 等投资收益衡量指标放在第二位。

(2) 决策者追求满意方案而并不一定是最优方案, 低碳行业的社会正效应, 可提升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 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额外收益。因此, 大型、有影响力的低碳企业会是保险公司资金流向的目标。

(3) 低碳行业属新兴产业, 政策、法律背景不成熟, 对保险公司来说, 虽然《保险法》(2009)《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不断出台, 有关低碳行业《十一五规划纲要》有明确指示, 但是多方面限制很可能产生投资阻碍, 并且不断放开的投资政策使保险资金更倾向于投资熟悉的行业, 因此对低碳产业的法律规定及政策引导很重要, 以促使保险公司在投资于低碳行业股权时不再有“捞一票就走”的行为。决策者的偏好是多样的、可变的, 他们的偏好经常在决策过程中形成, 所以, 政府适时的引导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是可行的。

2.2 投资者的心理特征

(1) 自信情节: 高估自己的判断力, 过分自信。分析人员在做预测时会高估项目投资收益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的风险, 或者在估计“碳价格”时有意缩小价格波动的区间。

(2) 回避损失: 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 而在经济活动中, 人们对“趋利”与“避害”的选择是首先考虑如何避免损失, 其次才是获取收益。在投资于低碳行业时, 出于回避损失的考虑, 保险公司会投资于正在快速发展、大型的企业, 但是, 相比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更需要资金支持。

(3) 追求时尚和从众心理: 我们可以运用股市中常出现的“羊群效应”来解释保险资金在其运用范围放宽与国家低碳环保政策出台后普遍的流向, 从长远考虑, 如果不加限制, 极有可能造成某一产业产能过剩, 浪费资源。

3 结论及建议

3.1 政府引导和监督

由于低碳产业发展历程较短, 因此除了传统融资方式外, 会大力开拓其他类型的融资方式, 保险资金的介入是对融资方式的拓展。其次, 国家对低碳产业如风能发电、光伏电池等给予政策扶持。尤其是中小节能环保的产业, 在经营模式、技术等方面不成熟, 政府的支持会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有利其融资, 当然会更吸引保险资金介入。为避免保险资金无序流动, 需政府密切关注保险资金流向, 例如政府可成立监管委员会来引导和监督保险资金的运动, 在股票市场中, 虽有证券监管委员会, 但是专门的监管低碳板块的机构在保险资金大举入市及低碳板块成为持续热点的情况下并不为过。

3.2 技术创新

低碳行业由于其特殊性, 技术在衡量企业未来收益时占了很大比重, 保险资金投入企业很大比重是用于解决技术问题, 而技术的先进以及稳定性也是吸引保险资金入驻的主要因素。这两方面相互促进、互补, 保险公司在衡量时除了常用的报表模式分析企业投资收益(如 ROI、NPV 等)外, 更应关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企业文化等以确定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确保在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企业能开发出新技术或改良技术从而产生效益。

3.3 信息不对称

在股市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低碳行业的新兴起、低碳技术的新发展使低碳行业的信息不对称更加普遍, 保险公司与投资的低碳企业如何消除信息不对称成为重点。对此, 有以下建议: 1、多家保险公司成立联合资金管理公司, 随时交换关于低碳企业的信息, 投资期末利润按比例分成。2、

有实力的公司可收购中小型低碳企业，从而直接掌握企业的信息。

作者：李楠

来源：《东方企业文化》2011 年第 3 期

高新技术企业核心发展力实证研究



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高新技术企业的内外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高新技术企业、顾客、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实践表明，国内外许多已没落的著名高新技术企业都曾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未必能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理论界和实践界谈论最多的是核心竞争力，说明了核心竞争力对高新技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由众多力系推动的，仅仅强调核心竞争力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忽略了企业在其各个阶段以及各种环境下起关键作用的力，即核心发展力。企业在生存和发展中受九大力系的作用，即管理职能力系、文化力系、营销力系、品牌力系、产品力系、制造力系、资本力系、配置力系和科技力系，各力系又由若干力构成，这些力本研究称为企业发展力。

实际上，企业发展力的各力系、各要素对企业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和有轻重缓急之分的，在企业某个发展阶段，总是有某一个力系或这个力系中的某一个力处于薄弱环节并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对这种情况可能预先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当该发展力薄弱到足以威胁企业的生存时，企业就会发生危机，该发展力即为核心发展力。对企业核心发展力的关注应成为企业管理思维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拟立足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探讨核心发展力的内涵、结构，核心发展力与市场导向、竞争优势及企业绩效问的关系。

2 文献回顾

1990年，美国战略研究学者C. K. Prahalad和英国学者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概念，从而建立了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核心竞争力表现为企业在某些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越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除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贡献外，企业的其它关键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亚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没有取得较成熟的一致意见，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研究，一些主要的理论可以归结为资源能力论、网络论、协调论、组合论、知识创新论、元件——构架论、平台论、技术能力论、体制文化论、价值论等观点。

创新力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企业的目标就是创造顾客，企业只有两个基本的职能，一个是营销，另一个就是创新。[21p132—功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

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创新是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这种意义下的创新具体包括:1. 开发一种新产品或赋予产品新质;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方法;3. 开辟新市场,即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论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 控制或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全新供应来源;5. 实行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仅阐述了创新的形式和途径,而且指出了创新是企业的活力之源。德鲁克在1986年对创新作了进一步阐述,主张创新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定义。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创新是改变厂商资源的输出;而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创新则是改变资源所给予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总之,创新应填补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控制力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贡献。哈佛商学院罗伯特·西蒙斯在《控制》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20世纪90年代企业经理们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要求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企业中施加足够的控制”。罗伯特·西蒙斯教授提出了四种控制系统:诊断型控制系统、信仰系统、禁区系统和互动式控制系统。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逊管理学院伊查克·麦迪思博士在《企业生命周期》中首次提出“企业生命周期”,认为生命周期的概念不只适应于生命体,而且也适用于企业这样的组织。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一样主要通过灵活性与可控性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的。企业年轻时充满了灵活性,但控制力却不一定总是很强;企业老化时,可控性增加了,但灵活性却减少了。“年轻”说明企业做出变革调整相对容易,但由于控制水平比较低,其行为一般难以预测。“老”则意味着企业行为的控制力比较强,但缺乏灵活性,缺乏变革的意向。一个企业既有灵活性又有可控性,也就是说既不过于幼稚又非老态龙钟时,这个企业就同时具备了年轻和成熟的优势,表现得既具活力又具有控制力,称为“盛年期”。

艾迪斯在《企业生命周期》和《把握变革》两本著作中论述了健康管理思想,其主要内容为:健康管理公式 $Y=f[PAEI, CAPI]$,其中,P—目标,A—行政管理,E—创新,I—整合;C—合作,A—职权,P—权力,I—影响力;PAEI:以创新为中心,CAPI:以控制为中心。创新要获得长期的效率,必须整合行业内外各种资源。短期与长期的效率与效益,实质上是企业的赢利能力。从长期的效率(益)来考察,它是以创新为中心,整合实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灵活性与自控力取决于企业是如何组织制定决策的和执行决策的。要理解企业生命周期,就必须理解影响决策制定的因素以及决定实施效果与效率的因素。这两类因素都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冲突有关。因为正是缺乏均衡才能使运动与成长产生,均衡即死亡,那时就不存在变革的力量。艾迪斯认为企业老化的原因是由于灵活性的减少和可控制力的加强到了一定程度后造成的,因为企业会失去控制力,CAPI会破裂,所以企业最终会出现问题或疾病。每个利益集团都试图把企业拉向有利于自身但却有损整个企业的方向。灵活性和控制力是创新精神和CAPI的函数。高度的创新精神E和CAPI可以使企业既灵活又可控制,使企业行为处于可控状态。

我国的彭星闯教授在约瑟夫·A·熊彼特、罗伯特·西蒙斯、伊查克·麦迪思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发展力各力系中提取出了创新力和控制力,从而建立了二力统一理论。认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创新力和控制力,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企业就像生命体一样,创新力与控制力的统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任何优秀企业成功和长寿的共同“基因”,它与企业创立时间长短没有必然的联系,反之,创新力与控制力的失衡则是企业由盛而衰乃至丧失生命力的“病根”。在创新力与控制力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创新力是企业发展壮大前提,控制力是企业生命健康的保障。

本研究认为核心竞争力理论虽然揭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中心力量,但忽略了创新和控制这两种基本力量,二力统一理论虽然揭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新和控制的作用,但将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涵盖进去是不全面的,使企业发展失去了中心,也显得较为抽象。实际上企业发展力的各力系、各要素对企业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的、有轻重缓急之分的,

在企业某个发展阶段,总是有某一个力系或这个力系中的某一个力处于薄弱环节并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对这种情况可能预先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当该发展力薄弱到足以威胁企业的生存时,企业就会发生危机,该发展力笔者将它称为核心发展力。企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应建立核心发展力预警机制,这将为寻找、发现和确立核心发展力提供依据。本研究从以上各力系中提取出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并将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三力统一理论,这三种力量统一于企业的核心发展力。即企业核心发展力由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构成,企业应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控制力和创新力为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企业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法宝。

核心发展力除了与核心竞争力分离外,有时在企业发展的某个阶段,核心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会重合,也即当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时,或原有的核心竞争力失去优势而需要创新或重新构建时,构建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此时,企业核心发展力表现为核心竞争力。核心发展力除了表现为核心竞争力外,还经常表现为创新力和控制力。世界上许多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有半数以上是因企业家决策失误造成的,也即是由于对决策的控制力薄弱而导致的(此时,企业核心发展力表现为对决策的控制力)。核心发展力也需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当严重阻碍企业发展的某个核心发展力得到解决后,就要寻找和发现下一个严重阻碍企业发展的核心发展力。因此,企业要想持续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要将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三者保持和谐统一而形成有机整体。

核心发展力的识别和培育离不开市场导向。Narver and Slater认为,市场导向是一种组织文化,这种文化将促使组织创造并提供给顾客卓越的价值,进而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它可以通过三个构面来度量:顾客导向、竞争导向、跨部门协调。Kohli和Jaworski认为市场导向是企业为创造超顾客价值所进行的信息收集、信息分配与信息在企业内传递和使用的一个过程。Slater and Narver认为市场导向应当同时考虑顾客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但Narver and Slater与Kohli and Jawomki分别从组织文化和信息处理的角度提出的MKTOR量表与MARKOR量表却没有恰当地体现这一点,这导致了在调研时受访者对市场导向概念的理解更倾向于对“现有”的关注。Kumar等人则创造性地将市场导向分成两种互为补充的类型:市场驱动导向和驱动市场导向。

核心发展力的研究离不开竞争优势。Hofer and Shendel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将竞争优势定义为企业因资源利用方式而形成的相对于竞争者的独特地位。Fiegenbaum and Karnani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应变优势,即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在响应市场变化时所展现出来的柔性。Botten认为,竞争优势指的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或能力能够有效地达成其目的,反之,竞争弱势是指一个组织内的限制或脆弱点导致其无法达成其目的。Hamel和Prahalad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自身所具有的核心能力,企业之间核心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效率和收益的差异。这种能力隐藏在资源的背后,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组合和保护的能力。Foster and Kaplan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了竞争优势短期属性的观点以及产生这种竞争优势短期属性的经济和管理机制。库马尔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营销创新,实施变革型营销创新的公司是通过创造新市场或对品类进行根本性的重新界定而使竞争者落伍。

核心发展力的研究离不开企业绩效。企业绩效是战略管理的核心,因为绩效是对战略的真实检验。Gerald Albaum and David K. Tse将衡量组织绩效的指标分为两个维度:市场指标和财务指标。Jeremy galbreath and Peter Galvin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绩效,即市场份额、销售额和收益率。Kayhan Tajeddini、Myfanwy Trueman and Gretchen Larsen在研究市场导向对于创新的效果时,通过新产品在上年度的销售增长率、上年度公司市场份额增长、上年度公司的ROI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8]tas29-55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衡量企业绩效时,一般采用了一般财务性指标,还采用了一些非财务性指标。本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以财务性指标(销售利润率、净利润和投资回报率)和市场化指标(新产品开发、销售增长率和市场拓展)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3 模型假设与构建

3.1 构建理论模型及提出研究假设

Peter Drucker从企业的目的和职能出发,认为企业目标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其目的是创造顾客,基本职能是市场营销和创新,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市场中实现。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电子商务时代以及绿色营销时代的到来,对市场性质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市场以及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客观上使企业实行市场导向和追求企业绩效成为动态环境中企业经营的必然选择。因此核心发展力的识别和培育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创造持续竞争优势为手段,以获得良好的企业绩效为目的。本文将市场导向作为核心发展力的前置变量,将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作为核心发展力的后置变量构建了企业核心发展力概念模型如图一所示,提出并将验证H1——H15共15项假设(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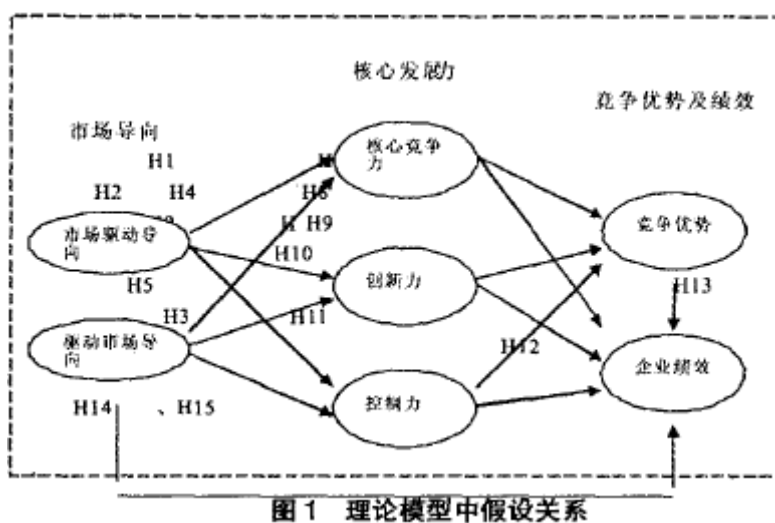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中假设关系

3.2 量表设计

在量表设计上我们主要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相关量表,例如企业绩效量表,本研究综合Pelham、Gerald Albaum and David K. Tse、Jeremy galbreath and Peter Galvin、Kayhan Tajeddini, Myfanwy Trueman and Gretchen Larsen和Kayhan Tajeddini, Myfanwy Trueman and Gretchen Larsen等学者的观点,以财务性指标(净利润、销售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和市场性指标(销售增长率、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至此,在保持国外已有成熟量表本质涵义的基础上,本研究对驱动市场导向等七个变量的量表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修改,以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达到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准确度量的目的。

4 实证分析

4.1 抽样

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跨省市、跨行业的抽样。具体调查采用网上调查方法进行:首先,通过一些省份的统计部门及各大搜索网站获得分布于各省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共1125家,它们分属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子、软件业等行业,各行业所占比例基本相等。将这1125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网上调查。首先,通过搜索网站搜索出这1125家企业某部门的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将调查问卷发到各企业的电子邮箱中,再通过手机短信或电话提醒对方,请对方及时填写

并返回问卷。最后,共回收问卷149份,其中有8份作答不完全,所以有效问卷为141份,有效率为12.53%(141/1125)。

4.2 数据分析

(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和数据的基本分析

运用Cronbach's 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信度与效度水平较高。在对数据进行基本分析上主要是运用均值和标准差等一般性统计方法,从整体的均值来看,除了驱动市场导向的评分较低外,其他变量的评分都较高。

(2) LISREL分析与研究假设检验

应用LISREL对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对研究假设H1—H15进行验证。(1)基本拟合标准:各个研究变量的标识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在0.52—0.83之间,都达到0.01显著性水平,且没有负的测量误差。这表明模型完全符合基本拟合标准。(2)整体模型拟合度: $\chi^2/df < 3$ 、 $P=0.48 > 0.05$ 、 $GFI=0.96 > 0.9$ 、 $SRMR=0.026 < 0.08$ 、 $RMSEA=0.03 < 0.06$ 。 $PNFI=0.71 > 0.5$ 、 $PGFI=0.62 > 0.5$ 。 $NFI=0.98 > 0.95$ 、 $NNFI=1.00 > 0.95$ 、 $CFI=1.00 > 0.95$ 。从以上三类指标与标准的比较情况可以看出,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度非常高。(3)模型内在结构拟合度:从组成信度来看,7个研究变量的组成信度分别为0.806、0.790、0.814、0.861、0.829、0.857和0.804,都在0.7以上;从平均变异抽取量来看,这些研究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分别为0.803、0.693、0.756、0.723、0.718、0.729和0.696,都在0.5以上。这显示本研究模型具有很好的内在结构拟合度。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非常理想的拟合度,可以利用它的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5 研究结论与研究创新

5.1 研究结论

(1)市场驱动导向和驱动市场导向对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有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Prahalad and Hamel的观点,也支持了彭星间教授的观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无论是采用市场驱动导向还是驱动市场导向,都应培育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关于市场导向对创新的影响的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认为市场导向可能阻止创新,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导向有助于创新。

(2)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彭星间教授和Prahalad and Hamel、Amit & Schoemaker、Kumar等学者的观点。

(3)市场驱动导向和驱动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彭星间教授和Kumar等学者的观点。

(4)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彭星间教授和Kumar等学者的观点。本研究支持了Prahalad and Hamel和彭星间教授的观点,也支持了Han、Baker and Sinkula、Han, Kim, and Srivastava和Baker and Sinkula等学者提出的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观点。否定了Bennett and Cooper和Atuahene—Gima的提出的创新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观点。这说明除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绩效有直接贡献外,创新力和控制力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不亚于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对企业绩效的路径系数较高,说明了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直接正向影响。

(5) 市场驱动导向和驱动市场导向通过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对竞争优势有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

(6) 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通过竞争优势对企业绩效有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

(7) 市场驱动导向和驱动市场导向通过企业核心发展力三要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 控制力和竞争优势对企业绩效有间接的积极正向影响。

5.2 研究创新

(1) 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大力研究和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 本研究提出了企业核心发展力的概念, 认为企业核心发展力由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构成, 这三种力的结合便形成了三力统一理论, 这三种力量统一于企业的核心发展力。企业应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中心, 以控制力和创新力为两个基本点。

(2) 首次对高新技术企业核心发展力与市场驱动导向、驱动市场导向、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 李先江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 《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基本思路



2007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中明确指出“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并提出“尽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几年来, 各级统计部门按照党委政府的要求, 在服务业统计领域积极探索大胆实践, 推动了服务业统计工作的发展, 为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开展的时间不长, 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 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差异也比较大, 亟待规范统一。本文拟对我国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并就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

1 调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为了分析方便, 首先对服务业统计调查给出一个概略的定义, 服务业统计调查是指调查对象涉及服务业中的活动单位且调查数据或行政记录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国家或地区某一服务行业的生产

成果、投入要素、生产条件及业务变化的统计活动。按照目前实施统计调查的主体来归纳,我国服务业统计调查主要由3部分构成。

一是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并由各级统计系统负责实施的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这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专门针对服务业中某些门类和行业大

类进行的统计调查项目,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调查,成品油批发和零售统计调查,房地产开发统计调查,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等。第二种是不专门针对服务业但涵盖全部服务业门类或部分服务业门类的统计调查项目,主要包括经济普查、基本单位统计调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调查、劳动统计调查、能源统计调查、科技综合统计、高技术产业综合统计、企业集团统计、企业景气调查等。

二是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对其管理系统或行业实施的统计调查项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开展的统计调查项目种类繁多、专业性很强,各管理部门的统计调查项目是否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需要仔细甄别。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的统计调查内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某一服务行业的生产发展情况。如人民银行组织实施的金融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布置并由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工业和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局等部门分别组织实施的运输邮电业统计报表制度,此类调查制度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而其中对公安部布置并由其实施的全国民用车辆拥有量调查则不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因为该制度只是对全社会运载工具的统计调查。第二种情况是该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内容只是反映该部门管理职能范围内的客观环境情况或业务处理情况,而不是反映某一服务行业的生产运行等情况,此类调查项目不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如国家统计局布置由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卫生部等部门组织实施的环境综合报表制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或结论,虽然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本身属于服务业,但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所进行的统计调查并不一定都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

三是由各地区组织并实施的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从国家统计局2003年部署开展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工作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许多省市统计部门根据当地党委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国家统计局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工作的部署,建立了反映本地区服务业发展情况和工作要求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云南、江苏、河南、湖北、山东、湖南、江西、云南、广州等省市都建立了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这些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就是下一部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2 调查制度的比较

目前,国家统计系统或有关部门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运输邮电业、银行业等一些传统服务业领域开展的统计调查项目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成熟的调查制度,其调查内容、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是全国一盘棋,其调查数据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特别是GDP核算的重要基础资料,因此这些制度不再纳入这里的比较分析。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实施的《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各地区实施的服务业调查制度进行综合比较,我们发现,目前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2.1 服务业统计调查覆盖的行业范围不一致

国家统计局布置的《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的调查统计范围包括12个行业大类,具体是: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社会福利业、体育、娱乐业。该调查制度主要由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实施。而各省市统计局在设计本地区服务业调查统计制度时,都扩展了服务业统计调

查的行业范围。北京市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调查范围包括了第三产业中的八个行业门类以及“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两个行业大类。上海市的调查范围包括了第三产业中的28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天津市的调查范围包括了第三产业中9个行业门类。江苏、江西省服务业统计制度的调查范围包括了第三产业中除国际组织外的14个行业门类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一个行业大类。浙江省的调查范围包括了第三产业的全都15个门类，湖南省的调查范围包括第三产业的15个门类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一个大类。

2.2 服务业统计调查对象的规模标准划分不一致

国家统计局《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规定，以各省所有企业为子总体按照行业分层、再按营业收入规模进一步分层后进行抽样并调查。而各地区实施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中，借鉴了其他传统行业的统计模式，对服务业企业和单位进行了规模或限额的划分。北京市服务业统计调查对象的规模划分标准是：全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和全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行政事业为规模以上企业和单位。上海市的规模划分标准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为规模以上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团及其他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在100人以上为规模以上单位。天津市的规模划分标准是：年营业收入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和年收入在300万元及以上的事业单位为限额以上企业或单位。浙江省的规模划分标准是：不同服务行业的企业和单位按不同的规模(限额)标准来划分，企业按营业收入划分，事业单位按支出规模划分。广州市的划分标准是：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为限额以上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年支出额达到400万元及以上的为限额以上单位。

2.3 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及组织实施的方式不一致

国家统计局《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规定对12个行业大类的企业采用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并主要由国家统计局调查系统组织实施。而各地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一般是对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的企业和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规模和限额以下的企业和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并主要由各地统计局组织实施，但各地其他管理部门参与配合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异。

上海市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由统计系统组织实施。这里的“条”是指一些企业及其他不宜按区域划分其经营活动的单位，不列入在地统计实施范围，由市统计局直接负责布置实施。北京市由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统一组织实施。浙江省采取“条块结合，分级实施”的组织实施方式来进行服务业统计调查，各级统计系统和各相关部门(含调查总队)按照职能分工的现状共同组织实施。山东省的组织实施方式是“统计部门为主、部门统计为补充”，政府统计部门指导规范各有关部门开展服务业全行业统计，没有明确部门管理的行业，由政府统计部门建立定期的抽样调查制度。江苏省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由统计部门和各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并规定可以结合行业的情况，采用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科学推算的方法来调查。

2.4 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调查内容不一致

国家统计局《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的主要调查内容是企业的基本情况、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情况。部分地区在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设计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北京市对规模以上企业和单位的调查内容包括法人单位基本情况统计、生产经营统计、财务状况统计、劳动工资统计、能源和水消费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固定资产投资费用价格统计、物流统计和中关村园区统计等；天津市的主要内容是企业 and 单位的财务状况以及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以及从业人员情况，对限额以下企业的调查内容为服务业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等。其他省市的调查内容和国家的调查内容大体一致。

2.5 服务业统计调查数据与各地地区的GDP核算制度没有对接

目前，我国GDP核算方法的统一性和各地区服务业统计制度多样性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一方面，

GDP年度核算、季度核算对专业基础数据的使用,全国有统一的规定和方法,各级统计部门都必须遵循。虽然这套规定和方法是在许多服务业行业的统计资料不甚健全或系统的情况下设计的,一些服务行业增加值推算和估算的成分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在调查范围、调查方法、调查内容、组织方式、调查对象划分标准上都不尽相同,而国家统一的GDP年度核算与季度核算方法并不容许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取得的数据资料进入到GDP核算的基础环节,这样地区服务业调查取得的数据资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从上述分析的情况可以看到,建立全国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已是刻不容缓,这是国务院对统计工作的明确要求,是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核算特别是GDP核算的迫切需要,也是基层统计部门的期待,更是统计本身的内在属性。笔者以为,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首先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

3.1 关于服务业统计范围的界定问题

从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设计思路看,各地对服务业的认识既有共识但又不完全一致。有的把服务业等价于第三产业,有的把服务业的范围扩展到第三产业之外包括了农、林、牧、渔服务业,这说明服务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但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概念还是有区别的,第三产业的概念是从人类生产活动发展的进程或阶段的角度来进行定义的,服务业的概念是从生产活动成果的物质属性来定义的。SNA(2008校订版)对服务的定义是:服务是指改变消费品的状况或促进产品和金融资产交换的生产活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原理,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单位可以归入到相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小类,进而归并到相应的中类、大类、门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对统计资料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进行综合与归纳。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服务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在国民经济行业门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与归纳。因此,服务业的范围如何确定主要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

国际上对服务业究竟包括那些行业门类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按照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 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制度中就没有把境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这一门类包括在服务业范围中。而联合国2008年修订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 4)及其推荐的综合归类方法中,把境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归入到了服务业。美国则执行《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在其国民经济核算中把公用事业(含电力、天然气、蒸汽、水、污水处理)这个门类归入到了服务业的范围。可见,对服务业范围的认定国际上是有差异的。其实有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清楚差异在哪里。

2003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关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其中规定了三次产业包括的门类、大类,这是在国民经济行业门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分类。而对于服务业究竟包括那些具体门类、大类,国家统计局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从2006年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十一五”时期的服务业发展目标来看,其所指的服务业就是第三产业。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处理方式,因为在国际上服务业的概念比第三产业这一概念应用更加广泛。鉴于目前服务业统计发展的趋势,国家统一规范服务业的归类标准已经十分必要。笔者认为把服务业的范围和第三产业的范围进行完全对接比较合适。

3.2 服务业统计调查对象的标准问题

我国服务业从业单位十分庞大,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我国有从事服务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59万个,对所有服务业的企业和单位进行全面调查难度太大。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调查制度,

必须对服务业统计调查对象实施全国统一的划分标准。参考工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调查对象的划分标准,我国服务业企业统计调查对象的划分宜以营业收入200万元为标准。因为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为规模以上企业,按照工业增加值率一般为30%左右计算,一个营业收入500万元的工业企业,其增加值在150万元左右。餐饮、住宿企业年营业额在200万元及以上为限额以上企业,按餐饮、住宿行业的平均增加值率计算,一个200万元营业额的餐饮或住宿业企业其增加值一般在100万元左右。相对于工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来说,其他服务业行业的增加值率更高。因此,从规模或限额收入标准所包含的增加值来比较,我国服务业企业的规模或限额标准可以设定在200万元。当然,对于有些行业门类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垄断性经营的行业可以视具体情况来确定不同的标准。

3.3 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问题

国际上非普查年度服务业统计调查一般是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目前我国各行业统计调查中,对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的企业采用全面调查,对规模以下或限额以下的企业采用抽样调查。这也是目前各地区服务业统计制度中普遍采用的调查方法。服务业统计调查中,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的结合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行业内两种调查方法的结合,即对某些服务业,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企业采用全面调查,规模以下或限额以下采用抽样调查;二是行业之间两种方法的结合,即对某些服务业行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垄断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保险等行业可以采取全面调查的方法。在设计全国统一的服务业调查制度时,对于抽样调查的部分除了要满足推算全国数据的需要以外,还要使抽样框满足推算省市区数据的要求。各省市在贯彻国家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时,可以建立以地市为总体的抽样调查框,满足推算地市数据的要求。

3.4 服务业统计调查的内容问题

在省市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中,有许多创新可以借鉴。北京实施的企业“一套表”的统计调查方式,把涉及到服务业调查对象的所有调查内容包括财务情况、劳动工资情况、能源消费情况、企业投资情况等统一到一套制度之中一次布置到企业,而按照传统的分专业统计的方式,这四个方面的调查内容要分专业向企业布置四次。笔者认为,这种调查内容的设计,没有拘泥于传统思维和传统习惯,是对传统调查内容设计的创新和改造,代表着统计调查的发展方向。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制度调查的内容设计,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要把握我国统计调查方式改革发展的趋势,既要考虑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的效率与实际需要,又要考虑基层调查对象的承受力;既要考虑新增加的调查内容,又要考虑和其他专业制度已有内容的整合和衔接。因此,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可以借鉴企业“一套表”的模式来规范设计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把财务情况、劳动情况、能源消费情况、投资支出情况等纳入到调查内容之中,使一个统计调查项目同时满足多种不同的目的。

3.5 服务业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问题

从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来看,既有以统计部门为主组织实施的服务业统计调查,也有以部门为主组织实施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在统计部门内部,既有地方统计局负责组织的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也有国家统计局组织并由调查总队实施的部分服务业统计抽样调查项目。为了保持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整体协调性,有些省市由统计局牵头对国家布置的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和本地区制定的服务业调查制度进行了有机的整合;有些省市的国家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和地区制定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分别由调查总队和统计局组织实施,互不关联或重复交叉,这种现象不利于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的发展,也不便于服务业相关数据的衔接。按照我国“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的“尽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的要求,笔者认为,我国服务业统计调查不论是在工作的组织上还是在数据的采集方式上必须实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式,即各级统计局全面负责组织服务

业统计调查工作，各部门按照服务业统计制度的要求配合实施相关领域的调查工作。

4 完善我国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具体意见

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服务业统计制度进行再造，又需要我们建立新的调查制度，并在新旧制度之间进行有机的整合和衔接，逐步达到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要求。笔者以为，目前可以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设计好服务业统计调查的整体框架

首先，要以服务业为整体，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 T4754. 2002)的标准，以行业大类为对象全面规划设计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整体框架，因为行业大类的划分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便于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其次，要按照服务业统计的定义或标准对现有的统计调查项目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归类，把属于服务业统计的调查项目纳入到整体框架之中。前面已经阐述过，行政管理部门本身虽然属于服务业，但行政管理部门所开展的统计调查项目并不都属于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三是对整体框架中已有

的调查制度和需要新建立的制度进行整合。要按照服务业统计调查的目标要求，结合统计工作的发展趋势，统一设计服务业统计调查项目，特别是要把握好共性内容的设计。目前，一些地区将现有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调查制度、房地产开发统计调查、运输邮电业统计报表制度都纳入到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的框架之中，进行了整合设计。

4.2 重点突破，实施部分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

为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迫切需要，2003年我国实施了《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但这一调查项目的统计调查数据一直未进入到省一级GDP核算环节中。目前对所有服务业开展统计调查难度很大，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可充分借鉴各地区服务业统计调查的经验，在《部分服务业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部分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调查范围仍维持在现有的12个行业门类，对限额或规模以上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对限额或规模以下的企业实行抽样调查，形成与其他相关专业统计制度相互衔接的统计调查模式，该制度由各级统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在这项统计调查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将调查扩展到其他的行业。

4.3 在部分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中推行“一套表”的调查模式

建立规范完善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不能囿于传统的专业统计报表制度的设计思路，不能囿于统计系统内部机构设置的现有专业职能分工。应该在调查内容的设计上突出主要目的、兼顾其他目的，整合统计系统内部涉及到服务业行业的调查内容，以“一套表”的方式，对服务业调查内容进行组合设计。在服务业调查制度的内容设计上既要做好“加法”，又要做好“减法”。做“加法”就是要使服务业调查项目涵盖的调查内容丰富一些，可以包括财务指标、就业指标、能源消费指标，甚至可以把企业的投资支出情况纳入其中。做“减法”就是对服务业调查制度内的每一项调查内容，只设置最必要的调查指标，这样既可以发挥调查项目的效率，又能够最大可能减轻企业填报的负担。

4.4 搞好普查、“年报”、“定报”的衔接

在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设计中，要做好普查、年报、定报的衔接，对调查方式、调查内容、调查指标的设计要在3种制度中通盘考虑，制度设计衔接的原则是：以普查制度为基准设计年报制度，再根据年报制度设计定报制度，使三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互相补充，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调查指标设计的原则是：普查的指标突出全面，年报的指标突出重点，定报的指标突出方便快捷。以美国

为例,其法律服务行业小类普查表中的数量指标为44个,年度调查表中的数量指标为24个,季度调查表中的数量指标仅为4个;调查数据衔接原则是:以普查数据校订年报数据,以年报数据校订定报数据。

4.5 试行服务业统计数据下算一级的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专业统计调查以及GDP核算中由于实行层次汇总上报、分级核算GDP,存在着上级对下级数据质量管理难度较大的现象,各级数据不衔接的问题比较突出,各方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比较多,当然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现有的统计管理和运行模式下,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统计数据管理的力度,创新数据管理方式。可以在部分服务业统计调查数据的管理上试行下算一级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统计局统一负责推算并汇总发布全国和各省的服务行业调查数据,省级统计部门负责推算并汇总发布各地市的调查数据,确保服务业统计调查数据的上下衔接,以避免出现制度是统一的而统计数据却不衔接的现象和问题。

作者:黄微分(湖南商学院经济学院);高勇(湖南省统计局)

来源:《统计研究》2009年第11期

美经济低迷 中美贸易“正面相撞”或增多

——专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何伟文



糟糕的非农就业数据、一再调低的经济增长预期以及近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等诸多利空消息,证实美国经济正在陷入低迷期。

而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中国的外贸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对此,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何伟文表示,美国提振经济的办法有限,这两年该国经济都将比较艰难,这可能会

致使中美贸易

“正面相撞”的几率增多,中美经贸将会进入困难更多的时期。

他建议,为应对此变化,中国的外贸企业要更多地打造品牌产品,同时考虑更多对外直接投资,把生产设施放到海外去。在外贸政策上,我国应一碗水端平,按照国际规则,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对外贸易。

美国经济低迷至少持续两年

中国经济时报:美国近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多家机构调低美国经济增长率预期,未来两三年,美国经济将呈怎样的发展态势?

何伟文:我估计今后两三年美国的经济走势是W型。但此W型并不是指两次探底,而是指经济增长幅度忽高忽低。虽然现在美国经济复苏没劲儿了,无论是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还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不行,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会出现负增长。我估计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1%—2%,全年也差不多如此,保持勉强正增长。总的来说,经济低迷是肯定的。

中国经济时报：美国经济低迷会持续多久？

何伟文：我们要看到美国还有勉强正增长的理由：个人收入和就业都在缓慢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流动资金也在增加。客观上具备一定正增长的条件。

之所以如此低迷，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政府政策杂乱无章，看不出头绪，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信心。企业有钱不敢投资，消费者也不敢消费。二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好，房价低迷，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三是美国经济要起来，要看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美国重塑制造业已有两年，虽然有些恢复性增长，但还没有达到衰退前的水平，制造业依然增长乏力。美国找不到一个增长点，经济复苏缺乏后劲。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当前只有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的余地也不大。这样来看，美国提振经济的办法不多，这就决定了这两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比较缓慢、艰难。

“正面相撞”增多，中美经贸进入困难时期

中国经济时报：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将给我国外贸带来怎样的影响？

何伟文：首先，美国市场不好，肯定会影响我国出口。其次，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将导致美国和中国出口生产的矛盾急剧增加。美国某机构近日做过一个调查，9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制造很重要，这一概率比去年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而美国全国制造商联盟也提出了一个全国制造业战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全国出口战略是相呼应的，认为全球化影响了美国经济。该战略鼓励美国人要买美国货，且要政府给一定的政策振兴制造业。并且特别提到，中国使美国制造业失败、就业失败，要抗拒中国，惩罚中国，向中国征收 20% 的关税。进入大选年后，这种声音将越来越强烈。

今后，中美在新能源、新兴产业上的矛盾将非常大，中美在制造业上的“正面相撞”会更多，中美经贸将进入困难更多的时期。

把生产设施放到海外去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美国市场的变化，我国的外贸企业和外贸政策需要作出哪些调整？

何伟文：对于外贸企业来说，首先要更多地打造品牌产品，这样可以大幅度提价，也可错位竞争。二是要更多考虑直接投资，把生产设施放到海外去。比如可以直接放到美国去，或者可以投到别的国家再对美国出口。特别是可以考虑在美国多收购一些制造业企业。比如万向集团在美国就收购了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做得都很成功，这是双赢。我们不要只看到美国政策对中国投资的歧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在外贸政策方面，出口退税必须坚持，并且要保持稳定。出口退税是符合国际规则的做法。出口退税不要来回调，这一点保持稳定的话，汇率的变动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就会小得多。

此外，出口信贷要保持，不要怕人家说我们出口多。目前我国的人均出口还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且我国也不是光靠出口拉动经济。从过去十多年可以看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一般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大部分还是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扩大出口。但我们要按照国际规则，公开、公平、公正地来做。

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国有企业，不要给他们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补贴和优惠。否则会授人以柄，对我们的出口极为不利。外贸政策应该一碗水端平，国企不应该有看不见的好处。

中国经济时报：美国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致使美元走软，人民币相对升值，我国出口企业该如何应对？

何伟文：第一，出口企业要多采取其他货币结算；第二，出口企业要适当转型。特别是消费品出

口生产企业，要多和国外的设计师合作，因为要想提高产品的销量和增加值，第一点就是设计。特别是对欧美出口，一定要找欧美设计师，这样的话，出口产品的销量、价格一定会上去，汇率波动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了。

此外，还要看竞争者的汇率变化，比如印度、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汇率怎么样，如果都涨得比较厉害，那么汇率问题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就不会太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分析一下今年我国外贸形势的新变化。

何伟文：主要有两点。其一，今年我国外贸增长速度将放慢；其二，新兴经济体占我国外贸的比重将会增加，欧盟和美国的比重会略有下降。

作者：赵海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9-8）

高利贷的沃土

高利贷风险节节上升，但人们依然挺而走险。反讽的是，在一个因超发货币而广受诟病的货币体制中，货币本身却成为稀缺资源，一度成为无风险套利工具。

高利贷案件频发，说明已经进入高危区，目前以民间金融进入高利贷市场的人是在接最后一棒。

主要是低效管制惹的祸。

1 信贷管制

信贷管制是紧缩货币的核武器。受到大型企业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全球低息潮的困扰，中国央行既不能加息又不愿意发放保值贴补债券，汇率升值抑制通胀效果有待检验，信贷管制成为紧缩货币的上佳选择。

目前对银行的信贷管制已经到达极致，信贷额度被大幅削减，银行的日均存贷比要上报，信贷权上收分行甚至总行。贸易融资类授信被停止，以往被视为大餐的地方平台贷在今年 4 月也受到控制。在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 2011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中，银监会要求所有银行对平台贷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信贷审批权统一上收总行。今年 7 月，在 2011 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特别提出要认真处理好铁路系统贷款和公路建设贷款问题，同时也提出要防范“影子银行”业务风险。此后的 8 月 22 日下午，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建设银行领导层表示表示“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是控制新增贷款规模，收回支行铁道部贷款审批权”，“建行已经对整个公路投资进行了严格控制，调整风险限额，全部上收支行公路信贷审批权，尤其严控云南地区”。看来，作为银行利基的存贷差将缩小，银行不得不在中间业务收入等方面突围。

每次信贷管制，中小企业是直接的、永远的受害者。一旦开始信贷管制，中小企业马上失血，为了缓解资金紧张情况，不惜以高利贷饮鸩止渴，信贷管制培育了肥沃的高利贷需求土壤。笔者曾听温州企业家描述，一些取得银行授信的企业误以为只要有周转的头寸就可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不料银

行收回贷款后不再发贷，导致企业处于不借高利贷等死、借高利贷找死的绝境之中。

紧缩货币无罪，但紧缩货币以紧缩信贷的方式进行，并且打压的大棒永远打在民企、中小企业的身上，则是计划色彩浓厚的信贷管制之罪。

今年 4 月 13 日，传说资产高达 40 亿元的包头巨商金利斌以惨烈的方式自焚身亡，身后留下 14 多亿元的高利债务，包头部分商业银行、农信社、典当行、担保公司及大量个人卷入其中。这一方式，是民间金融面对金融失血症困顿挣扎的象征。

2 利率管制

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受到严厉管制。经过艰苦的利率改革，利率改革成果局限于实行较小的浮动区间。2004 年 10 月 29 日，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不再设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对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但其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 2.3 倍。所有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保持不变，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今年 8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应抓住时机逐步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而不是一次性完全放松利率管制；应先允许部分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试行市场化定价，限制不达标金融机构的定价权。提出的调控目标包括将贷款利率下限由现行的贷款基准利率 0.9 倍放宽至 0.8 倍。

改革中如此微小的一步，完全无法成为民间市场利率的标杆。此时，民间高利贷已经如火如荼。目前连大型企业都无法在银行获得平价贷款，中小企业早已进入信贷严冬，市场实际利率节节上升，民间金融链条成为高利贷链条的代名词。

不仅五花八门的民间资金进入高利贷市场，连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也溢出常轨，获取高利贷收益。银行觊觎高利贷厚利，纷纷暗度陈仓。今年 7 月 18 号《东方早报》发表文章，指出“高利贷资金链频现银行掮客”，直指部分商业银行联手担保公司抽取高额佣金。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民间借贷高峰地区的江浙，少数银行克扣已批下来的短期贷款，与担保公司联手，向急于获得中转资金的企业签订高利息贷款合同。

暗度陈仓的手法层出不穷。担保公司是介入民间金融的急先锋。由于担保收益极低，只有千分之八的中介费，担保公司挟银保合作之便利条件，有银行与民间资金撑腰，成为民间金融市场的裸泳者。

今年 6 月中旬以来，厦门融典担保有限公司涉嫌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今年 1 月，厦门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赖月香，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也被立案侦查。未来担保公司破产的消息，会越来越多。担保公司早已突破了 4 倍的上限，利率在 10 倍或者银行利率的几十倍。7 月，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利益输送进行风险排查，并要求各地银监局严防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合作风险，但为时已晚。

担保公司受到歧视，在银监系统与地方金融办之间来回折腾，成就了高利贷的“伟业”。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 2010 年底，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 6894 亿元，较上年增长 69.9%；其中，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占融资性担保贷款总额的 77.2%。试想，如果触角遍及万千中小企业的融资性担保业务成为中小企业的高利贷诱惑者，情况难以设想。

市场价格受到管制，必然会以变相的办法重新浮现到市场。从银行到担保公司、从小额贷款公司到普通民众，全都涉足高利贷，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已经溢出央行与银监会利率管制的边界，向民间市场渗透。由于这一渗透过程广阔而无监管，因此更显疯狂。

3 融资渠道管制

银行平价融资渠道不畅，往往成为大企业的红利，债权与证券融资需要特权，融资渠道管制催生无风险套利空间。

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盛行。据人民网统计，截至 9 月 6 日，沪深两市有 119 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 59 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 171.95 亿元，同比增长近 38.2%。委托贷款年利率最低的为 12%，最高则达到 24.5%，远高于一些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

根据人民网及相关媒体统计，119 份“委托贷款”公告一共涉及 69 笔贷款，除去 6 笔贷款到期偿还和 4 笔贷款延期，剩下的 58 笔贷款当中有 44 笔从上市公司流出，16 笔贷款流入上市公司。即便是上市公司作为借方的 16 笔委托贷款，也多是由其控股股东提供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作为关联企业资金枢纽的作用相当明显。

上市公司是资金枢纽，相当于小型血站，为关联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上市已经成为解决公司甚至解决所有关联公司资金困境的最佳途径，也成为以货币博取高收益的套利来源。投资者希望上市公司为社会、为股东创造价值，当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为股东创造价值，说明资金配置的错乱。上市公司大多获得了超募，只要上市就黄金万两，这些公司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不务正业。

民间金融盛行说明银行资源配置失效，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盛行更让人担心中国金融生态恶化，一方面是资金浪费溢出实体经济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无数的实体经济坐困信贷紧缩愁城，嗷嗷待哺。资金配置的不公、资金配置的无效人为造就资金实利阶层。

要改变高利贷盛行局面，改变资金恶性套利行为，惟有改变“三管制”现象，使货币调控手段向更公平、更有效、更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叶檀

来源：FT 中文网（2011 年 9 月 7 日）

艰难的抉择：全球 CEO 更替新趋势

CEO 继任难题

与国外日趋成熟、因时而变的 CEO 更迭机制相比，中国企业 CEO 继任问题似乎一直在原地徘徊、难以突破。市场和行政的博弈，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内部制度的欠缺，使得中国 CEO 更迭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且不确定。

改革与发展经年的中国必须明白，在现有资源环境与要素约束条件下，持续经济增长面临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转型就要创新，创新必须变革。如何痛下决心，进行顶层设计再次释放制度红利？如何进一步激发企业深层次活力，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中国 CEO 的选聘更替是一个知微见著的窗口。

在全世界范围内，CEO 更替大幅减少，更替率仅有 11.6%；因为国有化程度高，中国公司的更替率更是低至 5.2%。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 CEO 的职业生涯变得更轻松，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在全球商业环境出现重大转折、CEO 面对挑战越发艰难的 2010 年，世界前 2500 家上市公司的 CEO 更替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

透过 CEO 的角色以及 CEO 角色对任期和更替的影响这一观察视角，我们发现，CEO 及其高级管理团队在业务中亲身实践的程度如何？他们如何参与自身领导的业务？这些因素对任期和更替的影响非常明显。而总部参与运营决策的程度越高，CEO 更替的频率可能就越高。

还有几个显著的趋势不容忽视。在全世界范围内，CEO 更替大幅减少：与 2009 年相比，更多的首席执行官留任。但这并不表示公司治理越来越宽松，CEO 更替率总体仍比 20 世纪 90 年代来得更高，CEO 所面临的业绩压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也的确表明，CEO 聘任和监督的某些基本趋势已经发展成了标准做法。

我们曾将 21 世纪的前十年看作“趋同而紧凑的十年”，这一趋势在 2010 年得以延续。比如，在全世界范围内，CEO 兼任董事会主席的情况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越来越多的 CEO 由公司内部人士担任，而不是从外部进行聘用。

对那些将北美和西欧视为世界商业中心的人而言，有一则更令人震惊的里程碑事件首次出现。一方面，大型上市公司正变得更为多元化，它们纷纷进入新兴经济体，而非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等成熟经济体。（图 1）按市值排列世界前 2500 家上市公司中，有 1/4 以上的公司在新兴经济体设立了总部，亚洲经济体（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已成为全球市场的新重心。另一方面，在过去的 11 年，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所占的比重已经以年复合增长率 14% 的速度增长；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公司所占比重增长了 24%。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公司，其所占比重增长强劲。在取样对象中，新上榜的公司中每 5 家就有 1 家来自中国。这意味着，2010 年全球前 2500 家上市公司中，新进的 415 家公司中有 83 家来自中国。实际上，自 2000 年以来，在前 2500 家公司中，位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公司已经减少了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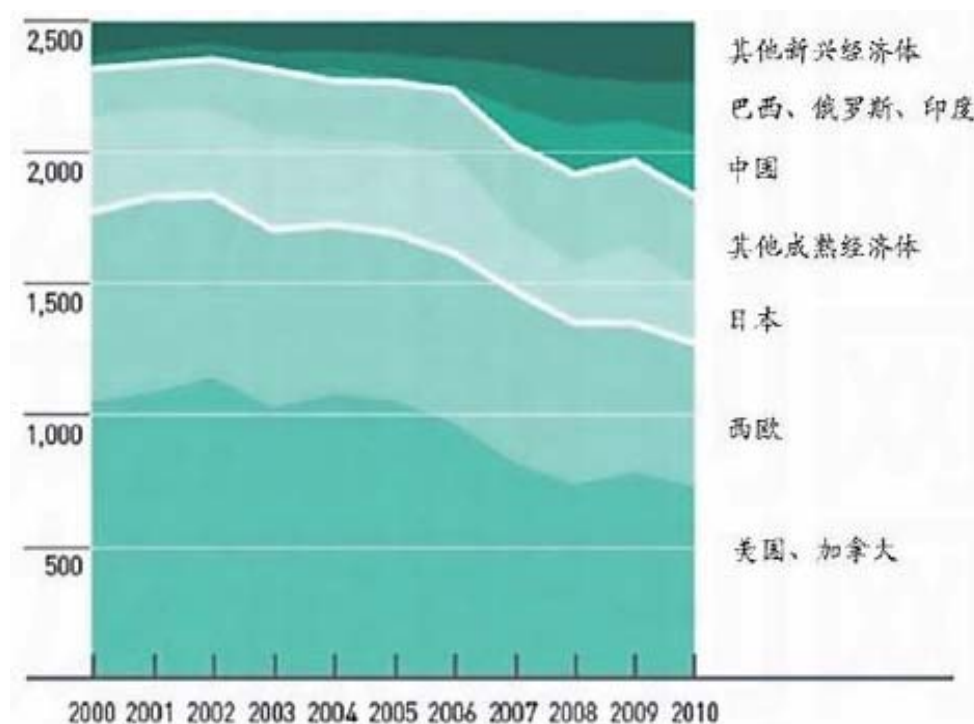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大型上市公司区域分布

全球公司治理新趋势

全球取样对象中的公司构成有所改变，这已经对 CEO 更替造成了影响，拥有新治理结构和不同发展曲线的公司开始崭露头角。

比如，有人可能会猜测，中国公司在取样对象中的比重上升，拉低了今年的全球 CEO 更替率。因为国有化程度高，中国的大公司的 CEO 更替率非常低，只是国际水平的一半。2010 年，世界范围内的 CEO 更替率为 11.6%，达到六年来最低值；而中国公司的更替率仅为 5.2%。

然而，2010 年 CEO 更替率下降，并非仅仅受到中国的影响。总体而言，大型公司的被迫更替和计划内更替都有大幅下降。原因可能有多种。首先，全球经济衰退对公司造成了后续影响，公司需要尽量保持管理层的稳定。其次，为确保更替顺利，董事会在选择 CEO 时更为慎重。最后，鉴于过去几年的被迫更替率达到历史高点，很多公司之前都已经更换了 CEO。

当然，许多长期治理趋势仍然保持不变。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董事会将董事会主席和 CEO 的职位进行了分离，这一做法在北美尤为普遍。在 2010 年，只有 14% 的继任 CEO 同时担任董事会主席（2001 年为 52%）。有些公司会任命离任 CEO 出任董事会主席，以便对继任 CEO 传授经验。我们发现，这种 CEO 学徒模式越来越盛行，但日本除外，因为学徒模式在日本早已发展成了准则（在日本，2/3 以上的 CEO 更替都会采取这一模式）。

任命公司内部人士为 CEO 是日本的另一传统，这一传统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在 2010 年的 291 个 CEO 更替案例中，由内部人士继任 CEO 的情况占到了 81%。根据 2010 年的数据，内部人士的任期也相对较长——内部人士的平均任期为 7.1 年，而外部人士的平均任期为 4.3 年。这不足为奇，内部人士一直以来都为公司股东创造了更多收益。去年也不例外。内部人士出任的 CEO 在离任时的股东收益率为 4.6%（按各地水平进行调整），而由外部人士出任的 CEO 所取得的股东收益率为 0.1%。

与十年前相比，CEO 上任时的平均年龄变大。2010 年离任的 CEO 在当初上任时的平均年龄为 52.2 岁，而在 2000 年时，平均年龄为 50.2 岁。这表明董事会在选择 CEO 时，还是一如既往地重视 CEO 的工作经验。在研究离任 CEO 时，我们发现，有些 CEO 之前已经在上市公司担任过 CEO 一职，该比重在过去 11 年明显增长，从 2000 年的 4.3% 上升到 2010 年的 15.2%。在 2010 年的继任 CEO 中，由外部人士出任的 CEO 中，超过一半（51%）的人士之前都有同行业从业经验，这表明董事会在寻找候选人类型时有了更明确的标准。

相比 11 年前，CEO 的任期越来越短。从离任的 CEO 来看，CEO 的平均任期比 11 年前缩短了 18 个月：2000 年时的平均任期为 8.1 年，而 2010 年的平均任期为 6.6 年。过去 11 年中，计划内更替的 CEO（董事会对 CEO 的离职日期提前进行了安排）的平均任期缩短了 30%，从十年减少为七年。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与前人相比，当今 CEO 的工作压力更大。

多角色扮演的企业核心

在今年研究世界各大上市公司 CEO 更替案例时，我们采用了新的研究角度——对企业核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企业核心由 CEO、CEO 所带领的高级管理团队，以及对整个公司而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支持职能部门组成。在一家典型的大公司里，高级管理层集中在总部办公，所有的企业核心都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公众和投资人面前代表公司，为事业部提供必不可少的重要服务，他们最大的责任是为公司创造盈利。这就是各家公司的共性。每一个 CEO 都认为企业核

心是各类技能、职责、个人管理风格的独特组合，符合公司的业务性质和公司所处的竞争环境。根据高管层以及企业核心参与管理各事业部的方式，我们将企业核心模式分为四个类型（图 2）。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控股型企业	战略管理型企业	积极管理型企业	运营参与型企业
我们是谁	我们是投资公司	我们为相关实体提供战略领导	我们对紧密相关的实体提供管理及战略领导	我们是业务管理者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看到成果	我们想知道您将做什么	我们想知道您会怎么做	我们想要密切参与业务运营
如何增值	通过组合管理实现增值	通过各事业部间的联系及其产生的协同效应而实现增值	与各事业部紧密合作，一同制定计划并为其提供专长服务	通过企业管理和对业务的控制实现增值
示例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LG 公司	麦克森公司	福特公司

图 2 企业四大核心管理模式

第一种模式表现了一种极端，这是一家高度多元化的控股型企业，在管理下属公司时，企业核心与下属公司保持了一定距离。控股型企业通过强健的组合管理实现了增值。第二种模式是战略管理型，在管理下属公司时，这类企业会在战略方向上提供指导及领导，并制定业绩期望。第三种模式包含了更多的积极管理，这类企业的企业核心会对下属公司进行更为严密的监督管理，并就运营提供建议。第四种模式是指企业核心高度参与公司运营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高级管理层在日常业务决策中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从事业部领导的角度进行描述：控股型企业想要看到业绩；战略管理型总部想要知道您想做什么；积极管理型企业核心想要知道您想怎么做；而运营参与型的企业核心想要在业务运营中与各事业部进行密切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公司的企业核心模式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过公司有时可能会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同一公司内不同的事业部可能会采用不同的企业核心模式。

在研究 CEO 更替和相关事宜时，我们对在这四类企业核心模式下工作的 CEO 进行了访问。他们的经验更好地阐明了这些模式的运行方式、CEO 更替模式（似乎与企业核心模式有关联）以及对商业领袖的启示。

控股型企业。在管理公司业务时，就如同基金经理在对投资组合进行监督管理。这类公司的企业核心会制定管理及财务规章并确保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但极少参与制定运营决策，他们最关心结果，而非过程。由于这类控股型企业的 CEO 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一线，如果公司出了什么问题，通常 CEO 手下负责业务运营的人员会最先发现端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 CEO 沃伦·巴菲特是这类管理模式的典型。

他在 2010 年年报中致股东的信中指出，“在伯克希尔，管理人员能将重心放在业务运营上：他们不用去总部开会，不会面临融资困扰，也不用担心华尔街的骚扰。我会每两年给他们写封信，他们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他们打电话的意愿差别很大。有些管理人员去年一整年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也有人几乎天天和我通话。相比制度流程，我们更愿意信赖员工本身。‘用对人，少管教’的法则对于我和他们都很适用。”

战略管理型企业。这类企业核心在管理地方业务时会向其提供战略指导，但并不是监督运营决策的制定。市值为 1040 亿美元的韩国 LG 公司是这种模式的典范，最早因其金星（Goldstar）品牌而闻名。由于 LG 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涉足电子消费品、移动通信、家用电器、化学等多个行业，乍看

之下会被定义为一家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样的多元化控股型企业。但 LG 公司的总裁兼 CEO Juno Cho 指出, 该公司的企业核心一直偏向战略管理模式。

当 LG 化学、LG 电子等各事业部的高管层在制定战略目标时, Cho 和其他高级管理层都会深入参与, 核心高管通常都会参与各事业部的董事会。Cho 说: “我们会和各事业部就战略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并让各事业部自行负责业务运营。” LG 公司的集团董事会主席与各事业部的总裁每年召开一次共识大会, 以便对年度业务计划进行了解及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Cho 说: “这是我们沟通交流的基础。” “企业高管层会主持各事业部的董事会, 这样我们就能实时了解公司的业绩表现, 但深入参与运营是不切实际的。既然 LG 是这样一家庞大的企业, 企业核心在品牌建设、研发支出、高层人事决定以及资本投资方面会尽量少发表意见。”

积极管理型企业。这类公司的企业核心会和各事业部共同负责制定重大运营决策, 通过提供密切指导和专家意见实现增值。位于北美的麦克森公司 (McKesson Corporation) 是业内领先的医药分销商和医疗信息技术公司, 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总裁兼 CEO 约翰·汉姆格莱 (John H. Hammergren) 认为, 他们公司的企业核心有时采用的是战略管理模式而有时又是积极管理模式。

Hammergren 说: “我们希望各事业部能推动麦克森公司文化的发展, 但企业核心还希望对各事业部的具体运营加以指导。在领导力发展方面, 我们采用了类似方法, 但在销售培训中, 我们期望各事业部能起主导作用, 因为销售培训与各事业部的具体业务密切相关。”

他认为, 麦克森公司的企业核心管理层发挥了几大关键作用。“首先, 他们确定了公司文化的基调: 高层基调。比如, 在高管层面以及当我们与各事业部领导进行互动时, 将采用哪些标准; 其次, 公司应该推行一系列制度, 确保各事业部能将客户看成重中之重。再次, 我们会对管理团队的整体节奏进行把握。换言之, 我们如何规划战略; 如何开展运营回顾; 我们对各事业部有哪些期望; 我们在驱动业务发展时, 会采用六西格玛和公司行事历等哪些流程。”企业核心管理层还规定了企业核心和各事业部在互动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决定哪些情况下各事业部应该向总部征求意见, 哪些情况可以独立行使权限并制定决策。

他说: “我们通过两个关键管理团队进行企业管理。首先是高管层, 包括直接向我报告的高管; 其次是由几个主要事业部的总裁所构成的运营团队。我会对各类主要业务进行视察, 至少每季度一次, 我会积极主动地参与事业部层面的预算制定和领导决策。高管层会议每隔一周召开一次, 以便了解各事业部的业绩、大型并购交易、华尔街预期、资本配置、领导力发展、更替计划、资产负债管理、董事会报告、企业总体战略等等。”

不过他认为, 要将麦克森的企业核心模式转变为完全参与运营的模式是非常困难的。“考虑到我们公司的业务复杂性, CEO 不可能每天都专注于运营执行层面的工作。具体的运营工作如同一场战争, 如果离它距离太近, 可能不知道要往哪派兵; 而实际运营这些业务的各事业部的管理层也会因为我过多参与具体运营而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可能比我在具体运营方面更为专业。”

运营参与型企业。这类公司的企业核心会更直接地参与业务管理。这并不意味着 CEO 和高管层会参与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 具体执行还是由各事业部负责。企业核心通过跨事业部发展和跨职能部门发展实现增值, 参与大多数或所有事业部的战略决策制定。因为企业核心高度参与业务管理, 所以这些企业通常只在单一行业发展。

CEO 艾伦·穆拉利 (Alan Mulally) 所领导的福特汽车公司是企业核心参与业务运营的典范。为了保持对汽车制造商基础业务更为严密的管理, Mulally 和他的主要高管团队决定集中精力发展福特品牌并舍弃旗下的豪华车品牌——一系列之前收购的高端车品牌。公司很快就出售了阿斯顿·马丁、捷豹、路虎、沃尔沃等品牌。福特公司还决定在一些核心平台精简车型, 将更多精力放在汽车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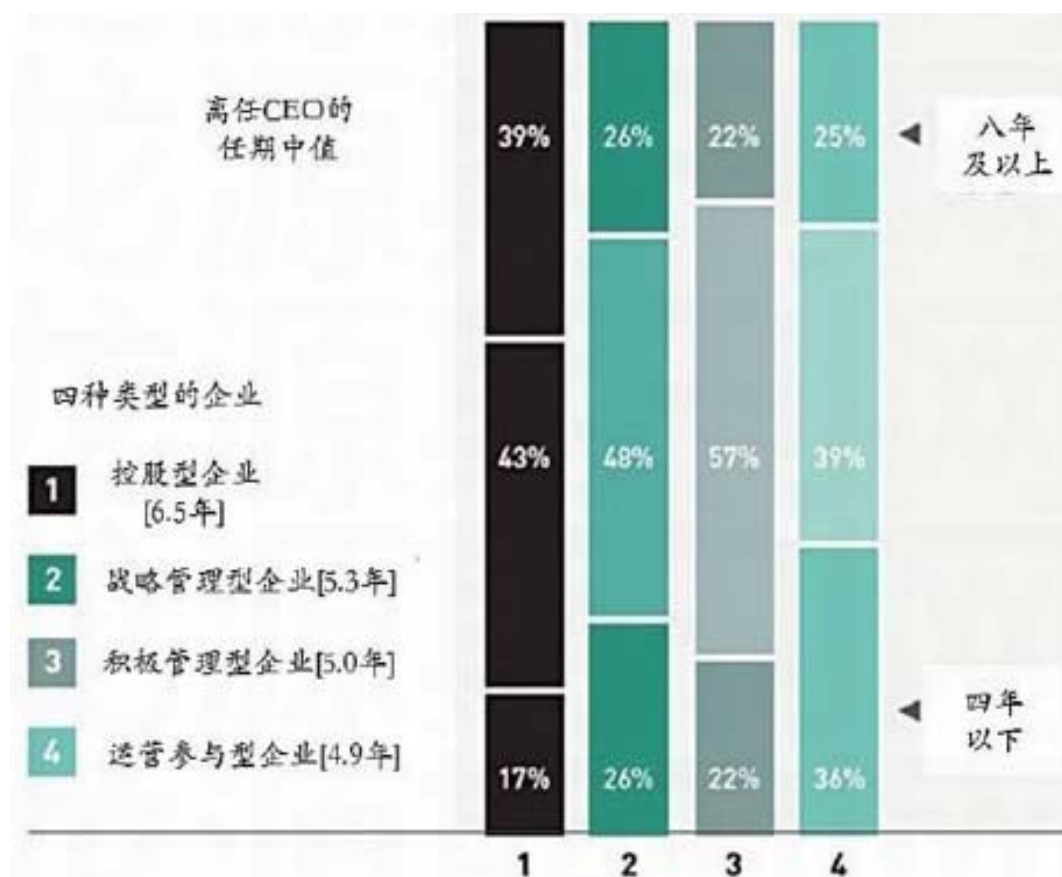
量及灵活度上。一方面，福特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产近百种不同车型；现在，数量减少了 2/3，可能还会继续减少。

Mulally 说，“你不会相信这么做所能带来的效果”，这能明确并简化福特公司所面临的管理难题。

CEO 的核心挑战

在今年的研究中，291 家企业经历了 CEO 更替，按照企业核心模式明确划分，可以发现其中 10% 是控股型企业，20% 是战略管理型企业，30% 是积极管理型企业，比重最大的是运营参与型企业，约占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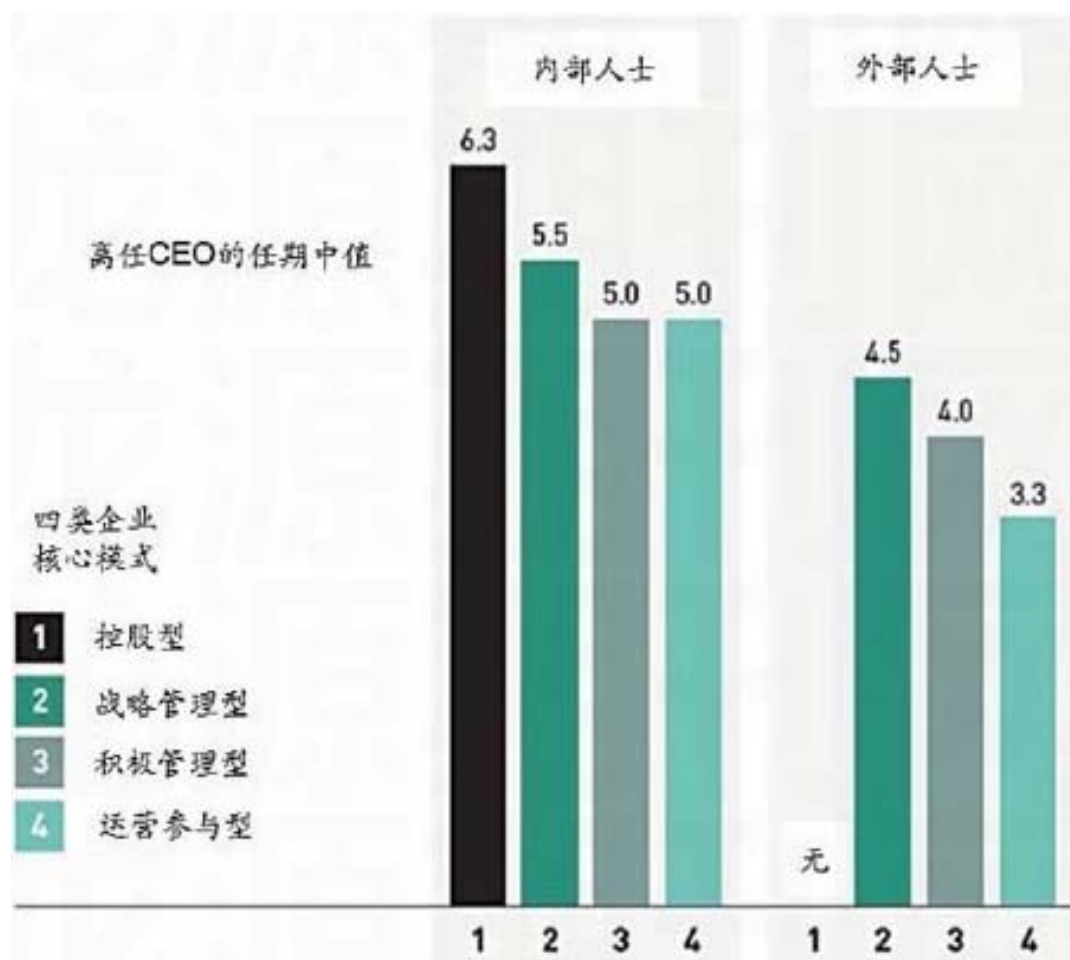
很明显，企业核心模式似乎会影响 CEO 的在任时间。2010 年离任的 CEO 中，控股型企业的 CEO 任期中值为 6.5 年，而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任期中值为 4.9 年。可见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任期无疑是比较短的，所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实际上，控股型企业的 CEO 任期比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任期平均长了 1/3。此外，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很有可能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就会离职（离任的比例高达 36%），这种可能性要比其他三类模式高得多（图 3）。



注：不含过渡 CEO 及并购后 CEO 更替。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总数可能不到 100。

图 3 离任 CEO 的任期

外聘的 CEO 通常面临更大的压力。除控股型企业以外的各类模式中，外聘 CEO 的任期比内部选拔的 CEO 的任期平均而言更短。运营参与型企业的外聘 CEO 的任期总体而言最短：平均在任时间仅为 3.3 年（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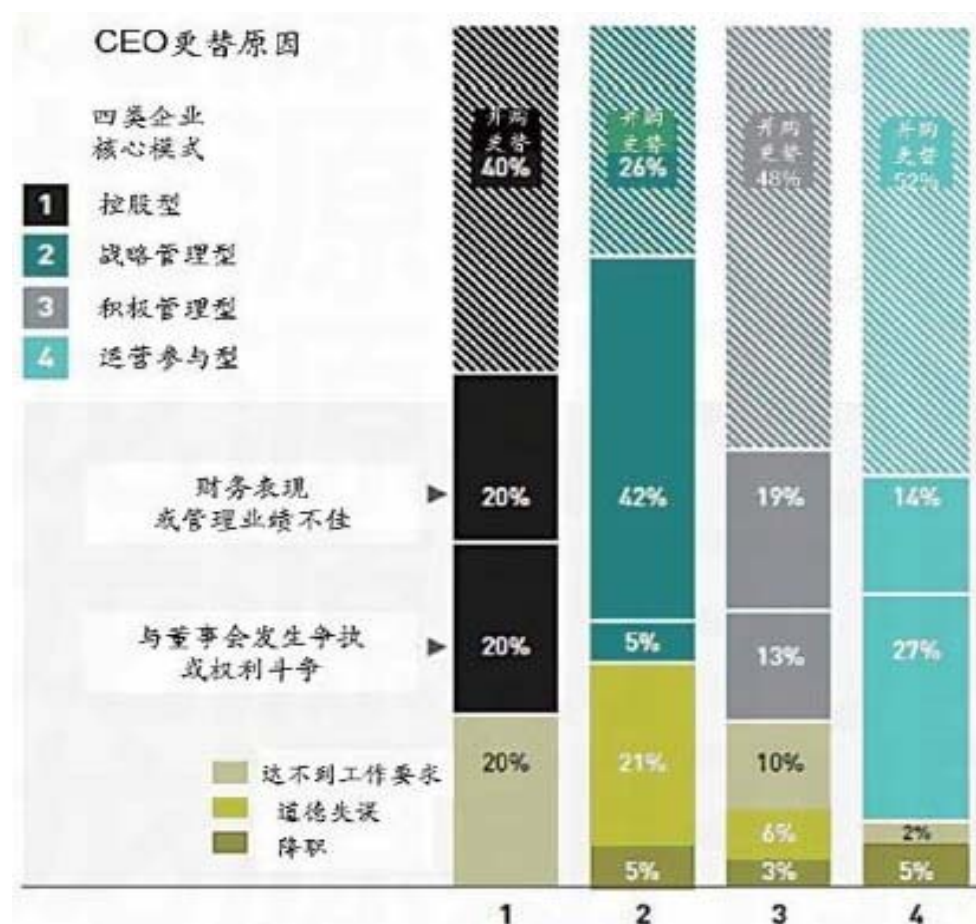
注：四种模式中，2010 年离职的 CEO 的任期中值各有不同，取决于 CEO 是内部选拔还是外部招聘；不含过渡 CEO、并购后 CEO 更替以及控股型企业中的外聘 CEO。

图 4 内部选拔与外聘 CEO 的任期

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更替率最高？这并不是因为这些 CEO 缺乏相关经验，这一类型公司的离任 CEO 之前拥有 CEO 经验的比例要比其他几类模式更高。也不是因为缺乏相关指导或支持。与控股型企业相比，CEO 学徒模式在运营参与型企业更为普遍（运营参与型企业的相关比例为 38%，控股型企业的比例为 32%），这一类型企业的总部在组织规模上通常更大。然而，运营参与型企业的 CEO 会面临某些特别的挑战。

运营参与型企业更有可能面临收购。并购后的 CEO 更替在运营参与型企业中最为常见。2010 年，并购后的 CEO 更替占运营参与型企业计划外更替的 52%，占控股型企业计划外更替的 40%，占战略管理型企业计划外更替的 26%。因为运营参与型企业通常会集中在单一行业发展，CEO 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为企业增加了价值，所以他们更容易成为并购对象。尽管其它两种模式企业参与并购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但通常只是购买或出售下属公司而不是整家企业，所以 CEO 的职位通常不会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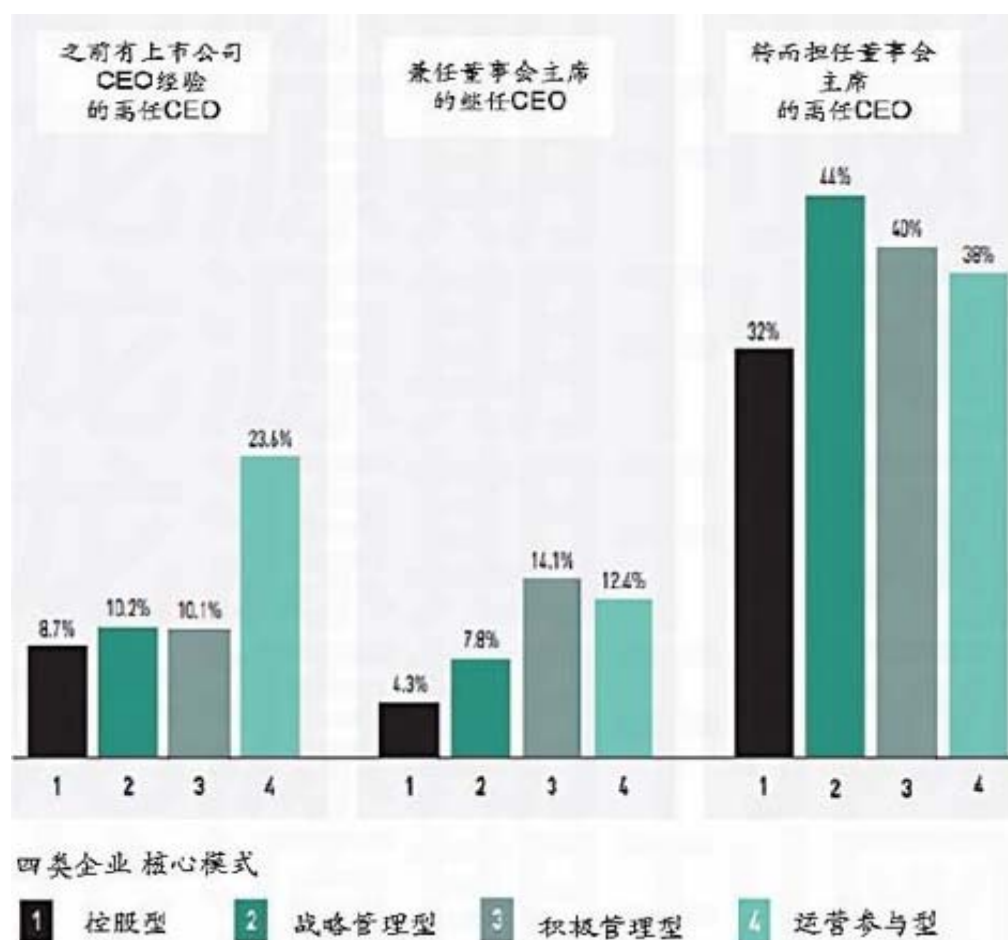
运营参与型企业通常更需要听从董事会的意见，更常出现权力斗争。2010 年，运营参与型企业 57% 的被迫更替（计划外更替与非并购后更替）是由于权力斗争造成的。相反，战略管理型企业的被迫更替主要是由财务表现不佳或管理业绩不良造成的（图 5）。如果企业开展单一业务或一系列紧密相关的业务，董事会就更容易对 CEO 战略进行严格监督，与其他内部专家发生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事实上，这类 CEO 职位的竞争更为激烈——在选拔聘任 CEO 时，通常会有多位精通业务的候选人。



注：被迫更替（不包括并购后更替）的分类依据包括各家企业的官方数据、媒体报道以及其他可靠的信息来源。图中因“达不到工作要求”而发生的更替是指由于工作难度变大导致 CEO 的能力无法胜任，或是该职位与 CEO 的自身能力不相匹配。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总数可能不到 100。

图 5 造成计划外更替的原因

在运营参与型企业和积极管理型企业，CEO 更有可能兼任董事会主席。平均而言，在这两种模式中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另外两种模式的两倍。总体而言，每十位 CEO 中仅有一位同时担任这两种职务，企业核心参与业务运营的程度越高，CEO 同时兼任董事会主席的可能性越大（图 6）。在欧洲企业中，这种关联性特别高。



注：不含过渡 CEO 和并购后 CEO 更替。

图 6 各类企业核心模式的 CEO 特征

乍看之下，这种关联性似乎令人费解。在任何一家 CEO 兼任董事会主席的公司，这类 CEO 都会面对大量的工作任务，他们既要管理董事会又要管理业务，而董事会要负责对 CEO 的战略进行监督。在运营参与型和积极管理型企业中，他们的角色会更具挑战性。有人可能会猜测这种趋势要么是反常现象（如果是这样，这种情况可能将在未来几年内消失），要么就表明有些董事会仍然认为由 CEO 兼任董事会主席对整个公司进行统一管理是最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

适应并弥补能力短板

几乎没有 CEO 会认为，调查的结果意在建议他们采用控股型企业核心模式。毕竟，大多数公司已经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形成了与他们独特的业务组合以及竞争战略相配套的企业核心结构。各种模式本无优劣之分，将公司的企业核心模式与具体业务要求相脱离，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

然而，如果 CEO 就职的公司恰巧是一家运营参与型企业，必须明白其职位特别具有挑战性。当然，其他企业核心模式的 CEO 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自 2000 年起，计划内更替的任期总体已经从十年减少为七年。在大型公司，CEO 要在任期内制定并执行工作计划，七年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然而作为继任 CEO，仍应该相应调整期望，准备在上任的最初几年尽早做出成绩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作为董事会成员或高管人员，如果正在寻找能长期胜任 CEO 的人选，那么所面临的挑战虽有不同却同样艰巨。在他们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很少有候选人能自动拥有管理大型跨国企业所需的广泛的

综合管理经验和职能专长。在控股型企业中,积极进取的高管人员应该有机会尽早对公司损益情况有所了解,但他们可能无法对整个组合有广泛了解或还未具备出色的职能专长。相反地,典型的运营参与型企业通常都有一支具备出色职能专长和丰富行业知识的高管核心团队,但他们可能欠缺综合管理经验。

现任 CEO 和董事会要负责制定 CEO 更替计划,培养一批全方位发展的候选人,克服公司的企业核心模式所存在的管理发展局限。控股型和战略管理型企业需要帮助综合管理人员培养职能专长和组合管理技能。积极管理型和运营参与型企业需要帮助职能专家积累综合管理经验。对自身职业发展有缜密规划的高管人员应该能够成功弥补自身能力上的不足。

总体而言,CEO 需要调整个人管理风格以适应公司的企业核心模式。尤其是新任 CEO,对任职公司的企业核心模式进行了解将有助自己形成更有利的局势。在控股型和战略管理型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面临特别大的挑战,必须学会将权力下放给他人,让他们负责具体的业务运营,以便集中精力在更大范围内为公司实现增值。而一位从外部选拔的 CEO 在刚刚进入一家积极管理型企业时,可以任命一两位受到推崇的内部人士担任高管,更为有效地融入整个公司,尽早为成功打下基础。如果在运营参与型企业担任 CEO,那么“将董事会看作战略伙伴”这条建议就尤为重要,因为在这类公司 CEO 被免职的情况,大多数是由于 CEO 与董事会发生了争执。与董事会的沟通互动越有效,CEO 享受计划内更替的可能性就越大。

CEO 的工作比以往更令人激动,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作者: Ken Favaro Per-Ola Karlsson Gary L. Neilso

来源:《董事会》2011 年第 8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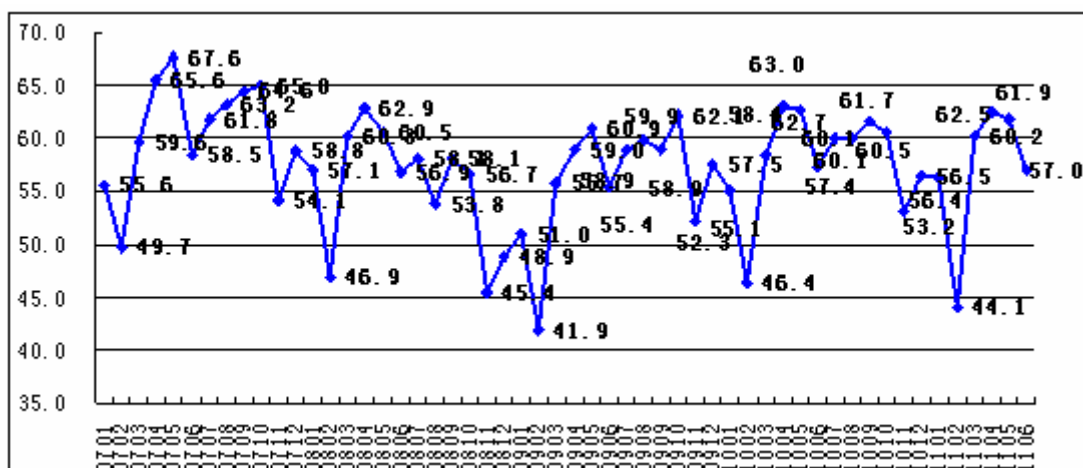
2011 年 6 月

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7.0%

2011 年 6 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0%,比上月回落 4.9 个百分点。由于非制造业没有综合指数,通常以商务活动指数来反映非制造业经济的总体变化。本月中国非制造业 PMI 各单项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6 月份,商务活动指数为 57.0%,虽然从 4 月份以来连续有所回落,但目前指数水平仍说明我国非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保障性住房建设加速推进,带动房屋及土木工程建筑业高位攀升。制造业活动的放缓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回调。消费淡季引致零售业和餐饮业等行业增长高位放缓。本月,中间投入价格指数和收费价格继续有所回落,虽幅度较小,但反映出价格过快上涨趋势基本得到控制,价格走势已进入高位趋稳的区间。本月新订单指数回落较明显,特别是交通运输业新订单普遍较低,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采购活动在放缓。这是否预示今后一段时间内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继续趋缓,值得关注。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走势图 (%)



新订单指数降幅较大。2011 年 6 月新订单指数为 53.5%，比上月回落 3.0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建筑业最高，为 65.6%；生产性服务业次之，为 54.8%；消费性服务业最低，为 48.5%。20 个行业中，建筑装饰业、房屋及土木工程建筑业、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建筑安装业和邮政业等行业高于 50%；本月位于 50%的是住宿业；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低于 50%。

中间投入价格指数小幅回调。2011 年 6 月中间投入价格指数为 61.6%，环比回落 0.4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建筑业最高，为 67.1%；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较为接近，分别为 60.6%和 60.1%。20 个行业中，房屋及土木工程建筑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和道路运输业等行业高于 60%；本月位于 60%的是邮政业；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零售业和批发业等行业在 50%-60%之间。

从业人员指数稍有回落。2011 年 6 月从业人员指数为 54.2%，环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本月建筑业最高，为 63.7%；生产性服务业次之，为 53.1%；消费性服务业最低，为 51.7%。20 个行业中，房屋及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餐饮业和建筑安装业等行业高于 50%；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等行业位于 50%；居民服务业和道路运输业等行业低于 5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延续高位回调。2011 年 6 月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7.8%，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建筑业最高，为 72.7%；生产性服务业次之，为 69.0%；消费性服务业最低，为 65.4%。20 个行业中，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航空运输业、零售业和建筑安装业等行业高于 60%；居民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在 50%-60%之间；其他服务业低于 50%。

中国非制造业 PMI 指数体系，由商务活动、新订单、新出口订单、积压订单、存货、中间投入价格、收费价格、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业务活动预期 10 项扩散指数构成。由于没有合成指数，国际上通常用商务活动指数来反映非制造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一般来说该指数达到 50%以上，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总体上升或增长；低于 50%，反映非制造业经济下降或回落。

来源：国家统计局企业和服务业调查信息网 (<http://esow.stats.gov.cn/asp/article.aspx?articleid=23817711>)